马列毛主义学习手册

工农解放社

二〇二六年七月

列 宁 语 录

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眞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毛 主 席 语 录

认眞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多思。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目录

绪论......3

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原则和学习技巧......4

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方法......5
学习方法与路径......6
理论学习技巧......9
学习原则......11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三个阶段......12
概念阶段......12
判断阶段......18
应用阶段......19

中国修正主义发展历程......20

修正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20
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原因......21
中国革命的背景......21
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22
走资派占据上风......23
走资派的经济基础......24
历史的偶然......25
无能的罪人华国锋......26
计划经济破坏后的“十年规划”......26
为反革命学说平反......28
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28
红色恐怖万岁！......29
农村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30
私营个体工商业为市场化铺路......32
企业的放权，掠夺的成全......34
价格双轨制......36
破坏计划经济后的混乱......37
双轨制的实施......40
利改税......42
企业的物质刺激......44
中国1980年代的通货膨胀......45
1989年社会群众运动......48
计划与市场的论战......57

南方谈话......58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巩固......62
国企改革......62
大下岗......63
工人福利被强制取消......65
农业问题......67
延迟经济危机......70
扩张海外市场......71
扩大国内市场......74
群众斗争的烈火在燃烧......75
建立新的先锋队的尝试......7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批判......82
去产能......84
去库存......87
去杠杆......89
降成本......91
补短板......92

关于修正主义官方哲学......97

（一）......97
（二）......98
（三）......101
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102
中修官方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105
（四）......112
西方马克思主义......113

关于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116

二十一世纪中国革命的若干问题......116
中国革命处于不发展的时期......117
长期以来的错误路线是中国革命不发展的内因......117
今天中国革命的任务与两条路线的斗争......119
什么是革命形势......120
怎样的准备才能把握住革命形势......126
如果不现在革命会怎么样......132
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34

绪论

理论斗争即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三大形式之一。思想斗争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反映，又对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给予伟大的影响并产生反作用。

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遵循毛泽东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对于现在的革命者来说，理论斗争还有其特殊且重大的意义。我们在一个思想比较混乱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工人运动的作为思想指导的地位被现代的“批评自由”派所不断攻击，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还没有完全将安托西修等资产阶级施加在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想彻底肃清，在革命运动内还有一个空谈政治报建党的歪曲《怎么办》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机会主义流派。

想要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肃清，就必须在理论上彻底指出他们的错误，就要在组织内开展理论斗争，要让每个成员都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学习，并且加之运用到实践中，具备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避免“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的教条主义学习法。

为了帮助有志于革命的同志尽快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编写了这本小册子，欢迎各位读者同志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

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原则和学习技巧

在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时，不能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而应当把三者结合起来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彼此孤立的三个部分，而是互为补充、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哲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我们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剥削关系和运动规律，驳斥了从错误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提供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则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又反过来检验和丰富哲学方法，推动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因此，三者不是简单并列的知识板块，而是在理论逻辑和实践斗争中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的统一整体。因此，原著学习不能采取“先学历史，再学其他内容”的机械顺序，而应当在历史发展中把握理论形成的条件和意义。

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时，也不能孤立地读文本，不能把经典著作当作抽象概念的堆积。应当把原著放回它产生的历史条件、现实斗争和理论论战中去理解，弄清楚作者是在回应什么问题、批判什么观点、解决什么矛盾。同时，还要把理论学习同实践斗争结合起来，在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检验、理解和运用原著中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读原著不是为了停留在书斋式的解释和概念辨析上，而是为了掌握分析现实、批判错误路线、指导革命实践的方法。只有把理论文章、历史背景、现实问题和实践斗争联系起来，才能避免断章取义和教条化理解，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学习理论也应当善于利用当代最新技术作为辅助。面对大量原著、理论文章和中修书籍，我们可以借助搜索工具、AI 工具、文本整理工具等方式，提高学习效率。比如，可以通过搜索工具快速查找概念出处、历史背景、相关论战和不同观点，可以利用 AI 帮助整理文章结构、概括论点论据、梳理逻辑链条。尤其是在阅读中修书籍时，更要善于借助这些工具，把表面上复杂、抽象的语言拆解开来，辨析其中的理论立场和修正主义实质。当然，技术只能作为辅助，不能代替独立思考和理论斗争。我们最终要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判断、分析各种观点。

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方法

这本手册围绕“怎样学习和运用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这一主线展开。它不是简单按照历史顺序来写，也不是先讲一段历史，再分别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围绕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来安排内容。也就是说，手册从读者怎样理解基本原理、怎样判断各种路线和观点、怎样进一步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出发，形成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推进的结构。

本手册的目的，不是罗列马列毛主义的各个知识点，也不是代替读者完成对经典原著的解释，而是帮助读者掌握学习原著的方法。学习理论，关键不只是知道某些结论，而是学会怎样阅读经典著作，怎样抓住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怎样联系历史背景、理论论战和现实斗争去理解原著。

本手册将按照理论学习中“概念—判断—推理”的学习阶段，展开学习方法的说明。这里的“概念—判断—推理”，不是把理论内容分成三个固定板块，而是指学习者理解理论时逐步深入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对基本概念有大概了

解；第二阶段，是能够对各种理论观点和现实观点作出初步判断；第三阶段，是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分析新问题，并参与新的理论和实践创造。

在“概念”阶段，学习者首先要建立基本的理论框架。读原著时，不能只记名词、背定义，而要知道一个概念大体属于哪一范畴，它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它揭示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内容。只有先对基本概念形成初步认识，才能在阅读原著和相关材料时不迷失方向。

在“判断”阶段，学习者要进一步学会辨析观点。读原著不能停留在“作者说了什么”，还要理解“批判的是什么观点”“维护的是什么立场”“为什么这样说”。通过联系历史事实、理论文章和现实斗争，学习者应当逐步能够判断一种观点的性质，判断它代表什么阶级立场，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在“推理”阶段，学习者要学会运用基本原理分析新的事物。理论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复述原著，也不是套用公式，而是能够面对新的问题、新的现象和新的斗争，运用已经掌握的概念和判断进行分析，说明事物为什么产生、怎样发展、会走向什么结果，并在实践中推动新的认识和新的创造。

因此，本手册强调的不是“记住多少知识点”，而是帮助学习者逐步形成理解理论、判断路线和参与实际斗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学习，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将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而会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学习方法与路径

核心原则：理论学习与实践斗争相结合

首先要明确两者间的关系，到底是理论放在第一呢，还是实践？是先学习看书还是先付诸行动？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是讨论的焦点，不弄懂就很容易犯错误。

以辩证态度看待这两者是精髓。我们既不能轻视理论也不能盲目实践。不能割裂机械的把二者拆分看待，要辩证，会变通。“理论使实践深入，同时理论本身又从实践中吸取新的力量和不断深化，使理论的作用更大。”（《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辈子，看书本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感悟也是学习，一次调研工人群众或者参与维权斗争也是……学习永无止境，他不局限于书本，在实践中，在我们个人的行动下，往往更能学到新东西，学得更好。正如同群众是从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的，我们也是，像毛泽东所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怎么使理论变为武器和指明灯？那就要和实际相结合，和运动相结合，和我们的实践脱离不开。所以纠结先干哪个没有意义，书是看不完的，在有一定理论基础后毒草也可以看看，现代的文章也一大堆，别提过去导师的著作，能安安心心把毛泽东所有《选集》《文选》《年谱》《大传》、相关回忆录等等看完，就“了不起了”。当然，感兴趣是可以多看的，关键在于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书海里好不好？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理论，科学世界观等，不是致力于把人培养成“理论家”，现在的大部分同志也称不上，而是在于打破旧世界，关乎于现在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现在的一切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做准备，忘了这个就会陷入空的理论钻研。所以这里先不主要提理论学习怎么怎么，而要强调实践问题。

虽然在整个学习过程，理论与实践常常是密不可分的。但主导地位仍然是实践，要明确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理论的出发点，也是理论的归宿点，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同于认识世界即为了改造世界，我们时刻不能忘了，斗争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是同工人群众相关的。然而过去的书籍就不能带我们领会这点，我们要学会同现在的实际社会联系比较，不参与生产就不能了解生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根本问题在于目的，学习的目的，实践的目的，斗争的目的，他们都与实践相关，都迫使我们付诸行动而不是局限于课本，我们想要无产阶级专政，解放生产力，就

不能不把实践看重，并且抓紧革命低潮的阶段抓紧实践锻炼。政治报派的观点显而就不同，他们把实践向后拖，实际就是阻碍革命，拖后腿，害怕同工人群众联系，害怕参与生产，保留小资产阶级习气作风。他们往往提到小册子，也就是"政治报"，列宁十月革命时期的政治宣传手册，他把同志和工人群众的思想都统一了起来，把共产党凝聚了起来。可笑的政治报派机械地运用这一策略，他们只看见列宁成立全国机关报安排写文章，就开始拙劣地模仿了。看看实际是怎么回事吧。“以后，和工人运动有关的每一个关键性问题，列宁都特别仔细地加以研究，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大家都知道，列宁在世界大战正激烈时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列宁著作的特点在于：他善于把理论同实际联系起来，不使任何问题脱离理论，并且善于把每个理论问题同目前形势，同活生生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理论成为对读者亲切易懂的东西。”再看“列宁是向谁学习讲话和写作通俗化呢？但是主要是向工人学，他同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问他们关于厂内他们生活上的一切详情细节，专心地倾听他们偶然提出的意见，听他们怎样提问题，观察他们的知识水平，他们对某一问题有什么不了解的，为什么不了解。工人们在回忆列宁时叙述了这些谈话情况。”(《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那么，怎样使我们了解群众所需？很简单，同吃同工作，成为一员，调研只是其中较片面的工作，如今社会，在繁忙的工作下，资本主义环境中，他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并且疲惫于下班后交流，我们的调研很难只通过问话采访获得全面信息，况且为了之后知道地方哪里有斗争并且引导，服务于写作，是有分工的，我们一定要安排大量的干部同志成为先进工人，有意识地做工作。为什么政治报派的文章没有人看且常常闹笑话，就是因为脱离了社会实践，哪些著作家没有人愿意真正了解工人们的生活情况，真诚地同他们交谈。宣传鼓动工作形式多样，可以给文章看，可以通过交流，更主要通过在斗争运动中带动，关键在于内容，那就要看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实践摸索，参与社会生产。

最后，再讲讲理论与实践同工作的联系。列宁指出，“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有种教育学的因素：必须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使全人类摆脱一切压迫而斗争的战士;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

科学也很少触动的代表们，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但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这是长期工作，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成果，但实际对工人群众的影响以及对同志们的锻炼是存在的，是打下了地基，我们不能只盯着"大运动"，只渴望大"风浪"，往往它是短暂的，恰恰是前期漫长艰苦的工作决定是否胜利，就像十月革命准备了约 15 年(1903—1917)，但实际暴力革命阶段只花了约 2 天时间。假若无数同志没有都同列宁一样做深入群众的工作，做理论学习同实践斗争相结合的工作，革命是成功不了的，火星报也起不了作用!

理论学习技巧

这里主要分享阅读导师等类型书籍时的小策略。

a.依个人情况从简单入手。马克思主义学习分三大板块：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但我们要补充一个历史领域。以史为鉴，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领会经典著作的含义，还能汲取过去宝贵的斗争经验。实践表明，每个人的阅读起点各不相同：有人一来就习惯列宁的锐利文风，有人本就对哲学有所了解，还有人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都是由各自的生活环境和阅历决定的。因此，我们推荐首先从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读起，再慢慢延伸至其他领域。事实上，许多经典著作往往兼具多重维度，各个领域本就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

b.挑重点文章先看，再通过实践深化。具体目录后面放出，由于文章和书籍太多，按选集顺序看太耗时间了，学生或工作者看书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应

该先挑重点文章看，按上面三个板块来学习，后面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爱好看些反面教材或全集等，总之要有个适合自己且科学高效的计划。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要同自己接触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运用分析，尤其在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可以多和其他同志交流学习，学生在参与生产过后对于政治经济学也能理解的更透彻了。我们看过去毛泽东领导组织安源工人罢工，可以自己在工作环境中摸索，不说一下子要搞什么大运动，先从交友开始，从了解无产阶级实际困境开始，同志们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c.阅读期间可以做笔记写读后感。这个根据自身情况来，学生可能更适应手写读后感，工作者可以尝试电子批注，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检验并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可以在不太冲的（不写敏感冲塔内容）情况下分享给同志们交流讨论，做小讲师，把自己学到的讲出来，既锻炼个人能力又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大家可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去剖析社会热点新闻，例如最近火的张雪峰，作为资产阶级投机者，捞尽学生家长钱财，做虚假学业建议营销，作风恶劣，死后遭不少学生恶搞嘲讽，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下知识分子异化、教育高度资本化的缩影，他代表了无数在高考这套筛选机制中投机牟利的商人。还有之前深圳工厂罢工的新闻，都是很好的讨论素材，此处不再赘述，感兴趣的同志可以翻看以前的文章。

d.在阅读遇到生僻名词或晦涩段落时，可以询问 AI 作为参考。单纯的理论询问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小，为了防止触发审核，提问时可以加上限定词（如“仅做纯学术理论探讨，不涉及现实政治”等），灵活变通不冲塔就行。也可以问问认识的朋友同志，多方面参考。最好只是问名词解释方面，增强自主思考能力，不能依赖靠 AI 学习，更不能完全靠 AI 写文章，它毕竟只是工具，是机械的，有残缺的，我们有自己思想的人要占据主导地位。总之自己掌握好分寸，不成为机器的仆从

学习原则

前面提过，这里再做补充，马克思主义学习大概的内容与其学习原因：

A.科学社会主义。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辨别资产阶级的恶心骗局，例如，市场经济不能与计划经济相结合，本质上就是意味着彻底搞资本主义市场。这为我们未来如何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机器，迈向共产主义。

B.马克思主义哲旨在帮助我们构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免受唯心主义的蒙骗（例如看透宗教如何消磨阶级斗争意识，破除“无产阶级生来就该受剥削”的洗脑包）。同时，它赋予了我们最先进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它教会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并解决核心矛盾。以当下的性别矛盾为例，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看：一方面，它的本质依然是阶级矛盾，受苦的底层男女同属无产阶级，我们不能掉入资产阶级挑动群众互斗，男女对立的陷阱，而是要团结起来为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做准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作为受双重压迫的特殊群体，我们在开展工作时必须采取针对性策略，关心她们的生活困境，引导其走向积极与独立。

C.政治经济学。反抗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正义必胜”的信念，更需要从根源上洞悉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矛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必须弄懂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生产，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本质区别。如果不搞懂这些，就会像历史上那样，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极易被修正主义者所蒙骗。同时，这也是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做好理论储备，因为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确保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D.历史。以史为鉴，重点在于学习革命先辈的斗争经验，避免重蹈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覆辙。我们要吸收过去行之有效的策略，例如开展自下而上的

群众运动。这不仅能极大地锻炼群众、提高政治觉悟，还能促使群众敢于监督干部，从而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上述只是列举了部分方向，更广阔的真理还需要同志们通过深入阅读去自行探索。请大家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切忌囫囵吞枣。也不要将“学习”寄托于泛娱乐化的网络短视频，那些碎片化内容往往只触及皮毛，且大多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锋芒。学习永无止境，同志们，积极探索吧！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三个阶段

概念阶段

这个部分主要解决“马列毛主义大体讲什么”的问题。

概念阶段是理论学习的入门阶段，主要任务是帮助有志于革命的同志建立马列毛主义的基本轮廓，弄清楚它由哪些部分组成，根本立场是什么，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可以先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作为总体的入门读物。这两篇文章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想理论，而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三者相互联系，共同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哲学方面，可以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说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并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矛盾论》说明事物的发展根源在于矛盾，分析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两篇文章帮助同志们掌握基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方法。

政治经济学方面，可以先读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初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之后，就可以阅读1976年上海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可以帮助学习者初步理解生产关系、所有制、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认识经济关系背后的阶级关系，同时也有助于读者从经济角度掌握马列毛主义的哲学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可以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怎么办？》《谈谈党内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国家与革命》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怎么办？》说明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的重要性，《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

这一阶段的重点，不是掌握全部理论细节，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基本了解，初步地掌握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政治经济学粗略分析剥削关系，在此基础上，认清正确的革命道路。基础打牢以后，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进一步判断各种观点和路线的性质。

下面是对上文中所提及的书籍的介绍：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

无产阶级政党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的，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坚决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于1912年布拉格党代表大会上与孟什维克从组织上决裂。与此同时，自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继续激化，新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即将到来。《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正是适应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和群众的需要而产生的。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1872 年到 1905 年俄国革命之间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俄国 1905 年革命以后新的革命风暴时期，讲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在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从众多社会主义派别的普通一员，发展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重要思想；在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在为未来革命做准备，同时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因素也在增长；在第三阶段，即 1905 年前后，掀起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风暴。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之初就是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言辞激烈地揭露了修正主义分子叛卖工人运动的罪行，满腔热情地支持俄国工人和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采取乐观主义的态度面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

阅读这篇著作，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历史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规律，并运用列宁所揭示的这个活动规律批判当前国际互联网上打着“政治报”旗号的空谈革命派。

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怎么办》简介

列宁的《怎么办？》写于 1901 年末至 1902 年初，1902 年 3 月出版。这本书不是一部抽象谈“宣传”“组织”“办报”的小册子，而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分散、经济主义泛滥、统一的革命政党尚未真正形成的条件下，为解决运动中最迫切问题而写成的战斗文献。这本书的矛头直指俄国的“经济派”，“经济派”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把工人斗争限制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经济斗争上，轻视革命理论、政治鼓动和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

《怎么办？》的中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办报”，而是用什么路线办报、由什么人办报、办报服务于什么样子的实际斗争。列宁提出全俄政治报，是因为俄国各地社会民主党小组分散孤立，缺乏统一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联系。全俄政治报要成为共同的思想和组织中心，把地方经验变成为全国经验，把零散小组锻造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列宁关于政治报的设想，正是要克服地方狭隘性、重复劳动、组织涣散和秘密工作薄弱的问题。列宁的政治报《火星报》后来确实成为统一党的力量、培养干部、打击“经济派”的中心。

政治报不是脱离地方工作的空中楼阁。没有各地区的地方小组，没有同工人阶级的结合，没有政治灌输，没有秘密原则，没有能够在群众中活动的革命干部，全国政治报就会变成空想的报纸。如果任由机会主义者集中各地小组，集中起来的就不会是执行革命路线的，而是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组织，报纸所传播的也不会是提高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内容，而可能只是经济主义、尾巴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谈。

今天，同志们阅读《怎么办？》的时候，必须结合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际。所谓的“政治报路线”，把办报看成脱离工人工作的，通过发行政治报所组成的“中央”的任务，把组织读书会、提高知识分子水平、建立线上中心看成当前工作的核心，而不是让报纸、写作、宣传和理论训练都服务于工人群众工作。这不是列宁的政治报路线，而是对列宁政治报思想的歪曲。真正的革命刊物，必须服务于工人工作，接受工人工作的领导。如果宣传工作脱离工人工作，不为工人工作服务，就会变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谈政治的“政治报”。

《怎么办？》批判“经济派”，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列宁反对的是把经济斗争绝对化，反对把工人运动停留在自发水平，反对把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降低为工会工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经济斗争，而在于经济斗争是否服从政治斗争，是否服务于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是否同社会主义灌输、秘密组织建设和革命政党建设结合起来。

在今天的中国，这一点更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工人往往连纯粹的经济斗争也难以自发地、稳定地组织起来。地区性的小组和个别工人，很难独立面对资本家和反动政府的双重打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本身并不等于经济主义。关键在于领导经济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追随自发情绪，只谈工资福利，不提高政治意识，那就是经济主义；如果是为了在工人中建立联系，培养先进分子，进行政治灌输，发展群众组织，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带到工人中去的必要环节。

所以，不能把工人工作探索过程中出现过的策略弯路，简单扣成“经济主义”。所谓“先罢工再政治灌输”的经验主义认识，如果被绝对化，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在实践中认识到这种观点的不足，并明确政治灌输必须贯穿工人工作的全过程，那么它的根本方向就不是经济主义。不能指望没

有交往、没有互助、没有实际联系，就能直接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也不能认为只有发生罢工，才能进行政治灌输。正确的路线，是在工人工作中把经济斗争、群众联系和政治灌输结合起来。

《怎么办？》提出的是一个涵盖了中央和地方工作的整体任务。在地方，要有能够同工人结合的秘密小组，要进行政治灌输，要培养先进工人和革命干部，在中央，要用全国性的政治报和统一组织，把各地正确经验集中起来，把地方斗争提高到全国政治斗争的高度。中央不能替代地方，报纸不能替代工人工作。中央和报纸只有建立在正确的地方工作和小组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工具。

列宁的政治报计划之所以正确，不只是因为它是“全国性的”，而是因为它由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反对经济主义、重视政治灌输、懂得秘密工作、能够同工人运动结合的革命者来领导。如果由机会主义者集中全国力量，集中起来的就不是革命路线，而是机会主义路线。那样的“政治报”就不会成为革命建党的脚手架，而会成为孟什维克路线的工具。只有由以列宁为核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政治报才能成为统一思想、统一组织、教育干部、打击机会主义的战斗机关。

《怎么办？》告诉我们，革命者要统一，但必须统一到正确路线和正确工作方法上。不是为了统一而统一，不是把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散漫、自由主义和空谈集中起来，而是把理论、宣传、组织和办报都统一到工人阶级工作中去，统一到政治灌输和群众组织建设中去，统一到培养革命干部和先进工人中去。《怎么办？》是反对经济主义、反对崇拜自发性、反对小组涣散、反对脱离工人的革命建党纲领。它要求把社会主义带到工人中去，要求把地方工人工作提高到全国政治斗争的高度。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列宁的政治报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 版简介

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普通的经济学教科书，而是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高度说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读物。

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以后，旧社会的痕迹并不会自然消失。商品、货币、工资、利润、按劳分配、企业核算，以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都还带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它们既可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滋长的土壤。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和改造。

全书从社会主义公有制讲起，说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并强调公有制不是一块招牌，不能认为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就万事大吉。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必须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书中把所有制、管理权、分配权、领导权和群众路线联系起来考察，反对资本统治劳动，反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专家治厂。

在生产问题上，书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了少数人发财，而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它强调计划领导、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强调工农业结合、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社会主义协作和竞赛。

在流通、分配和再生产问题上，书中分析商品交换、价格、货币、对外贸易、国民收入分配、个人消费品分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等内容。它的立场十分明确：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放任市场和利润支配社会生产，必须把商品货币关系置于计划和群众监督之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因素扩大。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本书不是孤立地讲经济技术，而是把经济问题放在阶级关系中考察。她说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脱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脱离两条路线斗争，不能脱离继续革命。社会主义不是没有矛盾的太平世界，而是新旧两种因素相互斗争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这是对列宁主义的新发展。

今日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历程正是这本书的反面教材。今日中修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竞争、资本经营、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包装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把民营资本、外资企业同国有经济并列为现代化建设力量；把利润原则、绩效管理、招商引资、资本市场和营商环境固定为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中修早已完成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化、

扩大化，已经凭借着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发展成为彻彻底底的资本帝国主义了。

1976 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正在这里。她告诉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坚持社会主义，不能只看有没有国有企业，不能只看国家能不能调控市场，也不能只看执政党是否还使用社会主义名义。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劳动人民是否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商品货币关系是否受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否被逐步缩小，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是否得到坚持，党内外资本主义因素是否受到继续斗争。

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就是为了看清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式。资本主义复辟不一定是通过公开取消共产党招牌来完成，它也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来完成。这本书揭露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修正主义实质，并说明—只有依靠工农群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向着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前进。

判断阶段

判断阶段，是在初步了解基本概念之后，进一步学习怎样辨析观点和路线性质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点，不是简单地阅读原著内容，而是要弄清楚革命导师在什么环境下，批判的是什么观点，维护的是什么立场，为什么这样说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阶段的学习方法，是把经典原著同持有正确路线的历史教科书（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结合起来阅读。先通过历史教科书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主要路线分歧，再回到原著中理解革命导师的具体观点。这样读，才能知道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在什么样的斗争中产生的，针对什么错误思想，服务什么革命任务。

读原著时，要把作者写这篇文章时的立场和斗争对象看清楚。不能只看作者说了什么概念，而要看这些概念用来批判谁、支持谁、解决什么问题。通过原著和历史背景的结合阅读，同志们才能逐步学会判断一种观点代表什么阶级立场，是否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会在实践中产生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应用阶段

推理阶段，也就是应用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是把已经掌握的概念和判断用于分析新问题、新现象、新斗争。理论学习的目的，不是复述原著，也不是套用公式，而是掌握革命导师的，对于当前条件下是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分析现实、批判错误路线、指导实践。

这一阶段，同志们不能只读正面材料，还要阅读反面教材。通过批判性地阅读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理论材料，同志们才能看清错误观点的根源、阶级立场和实际危害。同时，同志们还要经常地参与实际斗争，在思想争论和组织实践中运用理论。只有这样，同志们的理论水平才能真正成长。

在这一阶段，同志们要学会把现象放到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分析。面对一种观点、一条路线、一个现实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描述，而要追问一它为什么产生？代表什么利益？怎样发展？会导致什么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把理论变成斗争的武器。

理论必须在实践中运用。离开实践，理论就会变成空话，不经过斗争检验，认识就不会深化。同志们要在分析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争论和参与实际斗争中运用所学原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推动认识向前发展。

理论只有同实践联系，才会有生命力。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学习者能够把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进行革命斗争的能力，能够分析新事物，判断新路线，批判错误思想，并在斗争中形成新的认识。

修正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改革开放的历史，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历史。

改革开放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欣欣向荣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复辟是一场混乱的灾难，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攫取了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所创造的一切财富。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人通过这场混乱大捞一笔，成为了民营（新）资产阶级。他们所攫取的财富，为他们创造了天堂，同时也将工人阶级赶入苦难的地狱。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堕入无尽的深渊。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工人的权力被剥夺干净，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白色恐怖。不断加深的剥削程度，使工人阶级不敢言而敢怒。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农民阶级陷入苦难的泥潭。资本主义的复辟，使原本不断缩小的工农业剪刀差重新拉大。农民无法养活自己，只能进入工厂打工。承包制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阶级分化。中国的的农业正通过农民的血泪向资本主义农业迈进。

下面我们将谈谈改革开放的历程。

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原因

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从高处落下的人不受自己的想法支配，而受重力的支配一样。但是，历史规律却是一个合力，这个合力是由一个个偶然事件的力所组成的合力。偶然的事件，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造成历史的飞跃或倒退，但绝不会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有其历史背景。

中国革命的背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很大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不强大。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国情，走上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旧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而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致的。因此，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派混入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内部。事实上他们只承认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而并没有不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的理想。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讲的那样，“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革命无产者应当“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

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有一批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跑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他们的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时期，顽固地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人的思想是受社会条件支配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些人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世界观，抹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许多工农群众被资产阶级抹杀阶级斗争、宣扬拜金主义的文艺作品所毒害，便形成崇拜金钱的思想一样，这些跑到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人，如果不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彻底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难以改变。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必须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在现实生活的急剧变化中，才能得以根本改变。革命是人民的节日，是盛大的节日。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进程。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对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革命必然触犯了反动的一类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因而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反右”“整风”等一系列运动，都因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阻力而草草结束。

1960 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进攻，以及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资产阶级复辟活动，达到顶峰。与此同时，苏联变修。国内外的形势，使毛泽东为首的革命的共产党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清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反攻倒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其发动伊始，就遭到了来自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右派的反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都被称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占据上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光辉典范。但是，当时革命派的力量还很弱小，正如黑《人民日报》在 1977 年 3 月 14 日的所谓揭发“王张江姚”的黑文《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所供认的那样，“王张江姚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并且说：这个资产阶级是由老干部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所谓民主派组成的，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是一个规律。”而在黑《重庆日报》1977 年 8 月 19 日的《必须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文章上，赫然写着“张春桥狂叫：‘军队靠不住，军队最危险’，‘假如军队把枪掉过来，那怎么办！’”王洪文叫嚷“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他们最怕“老干部治军”，竭力鼓吹“揪军内资产阶级”，“抓带红五星的走资派”，妄图打倒一大批军队的领导干部。同时，他们又把黑手伸向民兵组织，王洪文在上海搞所谓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建立他们所谓的“第二武装"，妄图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政法机关，制造解放军和民兵的对立，篡夺军权。我市紧跟他们的那几个人，搞什么“重上井冈山”，“坚持持久战”，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在一次黑会上猖狂叫嚣，“有本事的就打进北京，谁先打进去，谁就当皇帝”。他们把黑手伸向国防工厂，为“夺取枪杆子”作准备，公然煽动说：“需要时可以到 xx 厂去拿枪”。在有的工厂，少数坏家伙还在那里按照王洪文的模子，搞什么“武装民兵”、“执勤队"、“敢死队”，迫害干部，镇压群众，大搞法西斯专政。”

这说明，革命派的实际力量仍然不够强大，多数革命派很晚才参加革命，他们是一代新人，而较早参加革命的人中，建国后做干部的，有许多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如文革后的所谓揭发材料中造反派所言，老中青三结合，实际上是老中造三结合。

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背景，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的相对强大与革命派力量的相对弱小。

走资派的经济基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之所以能成功，需要到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中寻找。

旧中国的工业极不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不发展，封建制度在中国极为普遍。这使得新中国在建国时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使中国迅速工业化，但是，在 60 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化并不完善，农业虽然实现了集体化，但是生产方式落后，机械化不多。世界银行材料反映，直到 1976 年，中国人口的 18%左右在城市，而 82%左右在农村。而中国的工业化占 GDP 的比例，在 1976 年为 45%左右。而 1976 年农村工业产值为 272 亿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2988.6 亿元。农村工业占经济总量的 9%左右。这说明，在 1976 年，农村经济依然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而农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依然很大。

中国 1960-1970 年代的农业不发达，使得虽然农业上实现了集体化，但是，农村仍然残余了大量的小私有制生产关系。而这些小私有制生产关系，就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正如列宁所言“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生产关系，正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

同时，正如张春桥同志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所讲的那样，“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 1960-1970 年代远未达到共产主义因素压倒性地战胜资本主义因素的程度。商品制度，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货币制度等资产阶级法权在中国仍有严重的残余。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因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即是资产阶级法权。而资产阶级法权在1960-1970年代的中国仍然有严重的残余，这一切是党内资产阶级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历史的偶然

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有其经济基础，但是，有复辟的经济基础不代表社会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倒退。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条路线——资本主义路线同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共产主义者和走资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执行着怎样的路线。所以，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但是，力量强大的一方并不一定能赢得斗争的胜利，复辟活动需要用反革命暴力推翻革命政权，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走资派都是通过军权，使用强力，推翻红色政权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胜利，完全是悖离历史趋势的偶然事件，是反动的历史倒退。而造成这一偶然事件的人——华国锋，是历史罪人。

偶然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而人是能够主动地改变世界的，也就是说，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能够主动改变世界，就能够主动地制造出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

华国锋集团，在1976年10月6日，阴谋政变逮捕中央革命派主要成员。并在全国对革命派进行屠杀。革命派并没有准备，且失去领导，最终被镇压。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自从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政变，中央革命派被逮捕以来，就已经开始了。

根据修正主义者的调查材料，我们可以看到，1976年10月，中国的革命派已经作好了和走资派决战的准备。然而，在1976年10月6日，小丑华国锋

联合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在怀仁堂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了中央革命派主要成员（“四人帮”），颠覆了社会主义中国。华国锋这个跳梁小丑，因一己私欲，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使中国重新陷入了黑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使中国人民滑入了苦难的深渊，世界革命人民失去坚强的靠山。华国锋这个历史罪人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无能的罪人华国锋

华国锋与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在 1976 到 1978 年三年时间里，在经济上可谓毫无建树，吃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老本，搞的是毫无规划的瞎干。投机者华国锋是通过阴谋手段，以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为靠山上的台。他的靠山决定了他只是一枚可有可无棋子，一旦他不按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行事，他就会被抛弃。

计划经济破坏后的“十年规划”

1975 年，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炮制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即“三项指示”。这三项指示，贯穿着一条资本主义路线。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又炮制了

一个《1976-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 10 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在讨论时就被中央的革命派批判，因而并未通过。

1976 年，小丑华国锋和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又把这个草案拿出来，加以修改，使之更适合复辟的需要，并作为经济方针加以运用。

复辟的道路，是造成中国生产力倒退，人民陷入苦难的道路。这一点，从复辟伊始，就得到了反映。

现行的中修官方读物，《邓小平时代》一书是这样评价“十年规划”的：一方面，“十年规划”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困难，造成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的紧张；另一方面，从十几年以后来看，“十年规划”中的多数项目已经成了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企业，如宝钢、贵州铝厂、咸阳彩色显像管厂、吉林化学公司等。当年引进的那些化肥厂，正在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化肥厂，今天的化肥供应一定会更加紧张。

多么狡诈的说辞，简直是给自己的无能刷上了来自过去的金漆。

“十年规划”的随意高指标投资，在中国引发了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首次通货膨胀。中修材料这样供认：

> “198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7.5%，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首次通货膨胀。此前，由于"洋跃进"的影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情况，只是到1980年才最终反映到物价水平上。这次过热和以前传统体制下的历次过热一样，直接原因主要是政府的投资膨胀，居民消费基本保持在正常水平。对这次过热的治理早在1979年就提上议程，反映在当年4月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但由于各方认识不一，直到1981年才得以有效进行（刘树成，2005：237一238）。治理手法主要还是利用行政命令：压缩基建规模、减少财政支出、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冻结企业存款（吴敬琏，2004：353）。此后，价格水平回落，1981-198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均保持在2%左右。”

为反革命学说平反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一方面是要通过这场讨论将华国锋赶下台，另一方面是强行统一思想，清除异已。

1977 年 2 月，以于光远为代表的一批反动学者进行了一场“学术大讨论”，排除了异已分子，把“唯生产力论”确立为正确的理论。

1978 年春，邓修集团为了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按劳分配讨论会”上，提出“按劳分配不是资本主义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坚决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之后，邓修集团将按劳分配写进了 1978 年宪法。

1977 年 12 月，邓修集团为商品经济翻了案，在国务院为准备第二年召开的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而发出的通知上说，“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同时，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在经济界的反动文人，进行了“反对文化大革命中限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反攻倒算，为邓修集团的复辟制造出“理论基础”。

1977 年夏，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又重新确立了“利润挂帅”原则。即所谓“明确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并将“利润挂帅”原则说成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

复辟是旧时落后统治阶级推翻进步统治阶级的行动。复辟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因而必然使用强力，以暂时扭转历史的前进，故其必定是暴力行动。

落后阶级总是咒骂进步阶级，说他们太暴力。

落后阶级永远不敢承认自己的暴力，却要“道貌岸然”地指责进步阶级的暴力。

共产主义者，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一批人，从来都不屑于掩饰自己的暴力，我们明白，暴力是新世界的助产婆，为了实现没有暴力的社会，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我们公开地宣告：

红色恐怖万岁！

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在小丑华国锋的帮助下夺取政权后，开始了对革命派的反攻倒算，即“揭批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运动和清查“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场运动，完全是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针对革命派的反攻倒算。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明证：

在 1966 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共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大意）。由此，这批高干子弟便一直被包庇了下来。即便在发动这场运动的讲话里，邓小平也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同上）——换句话说：即便走资派的老干部在文革中以“红卫兵”的模样出现，迫害无辜，指挥逼供信，操纵武斗，打人致伤致残，都没有关系，只要用轻轻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

修正主义在一张 1984 年的报纸上赫然写着：

““三种人”是“文革”的产物。从这个意义说，他们的罪行，确实离不开“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是，“三种人”并不是“文革”的“随大溜”者，他们是在“文革”中推波助澜的“乱世英雄”。他们参加“文革”是怀着私心、野心，真刀真枪、死心塌地造反的，干坏事有发挥、有创造，破坏性极大。而且，这些人往往是“十年一贯制”的“死硬派”，有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坚持极左的一套，明里暗里同党、同人民对着干。”

在修正主义全面复辟，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今日中国，“打入党内改造党”，“党内健康力量在发展”等等可耻的鬼话，无疑在文革后的白色恐怖中，就已经破产了。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就靠我们自己！

农村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

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拉开了全面复辟的序幕，全面复辟是从农村的集体经济开始的。

1976 年的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初步工业化，但是，根据今天中修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口 70%左右在农村地区。中国的历史原因，导致了很多农村地区的机械化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群众觉悟不高。农村成为资本主义的复辟的沃土。

修正主义的改革开放信息库是这样评论农村改革的：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这样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

这段话揭露了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第一枪，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小岗村是一个怎样的村子，为什么那里的农民要分田单干呢?

中修教科书有一段经典的对小岗村改革前的描述:

> “‘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往日的懒散、抑郁、无望的情绪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社员们争分夺秒地辛勤劳作。人们开玩笑说，以前是打铃很久也不肯出工干活，现在是天黑了大家还在地里不肯回家。”

我们会发现，小岗村“以前是打铃很久也不肯出工干活”。难怪小岗村闹饥荒。这分明是头脑中残留的“私”字在作怪，分明是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彻底清除的后果!

新中国的三大改造是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并不可能一下子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但人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观念，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转到社会主义观念上来，这限制了人们行动的进步。

社会主义会用其他先进公社的榜样，让小岗村明白，只有破除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私”字的束缚，才能打破饥荒的诅咒，才能让每个村民生活天天向上，才能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而资本主义却告诉小岗村：只有分田单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才能使农民拥有积极性。只有人人为自己，才能吃饱喝好。

邓修集团走资本主义路线，宣扬一套唯心的“私有制思想提高积极性”。他们在私有观念残余深重的小岗村试点分田单干，并将此作为经验宣传，以此作为他们的复辟行动的突破口。

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的复辟行径不得人心，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有良知的人都反对邓修集团的包产到户等复辟勾当。陕北一位老红军向中央写信，反对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农村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央会议上，“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受到反对，很多人说“这个问题关乎晚节，绝不能让步”。

但是，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干起“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勾当，将坚持农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调离工作岗位，甚至扣上“帮派分子”（革命派）的帽子。伴随着全国的白色恐怖，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终于使农业走上了资本主义路线。

下面这个中修的供认，是这一点的生动反映：

> 1980 年 5 月 31 日，正当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受到讨伐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
>
> 一次，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万里对陈云同志说，我那里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陈云同志合掌抱拳，高兴地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万里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 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很有可能会被注销的。

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撕开了一个裂口。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正是通过这个缺口，来推进资本主义彻底复辟的。

包产到户让农民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是，好日子是建立在农民按市场经济自由种地，自由出售农产品，而化肥农药农机等农用工业产品却按计划经济定价的基础上的。中国的农民因为自己的不觉悟，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他们的不觉悟，导致了他们在九十年代时遭受到了深重的苦难。

私营个体工商业为市场化铺路

修正主义官方恬不知耻地供认，“从本质上看，改革开放就是逐步认识、承认、确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基础性地位的过程，也是逐步认识、承认、培育、确立和保护民营经济市场地位和功能的过程。”（2012 年的供述，后来被

习近平修改为“决定性地位”）“改革开放创造了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奇迹，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也进一步助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二者相伴相生、共生共荣。”

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了为复辟资本主义打开市场缺口，以为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市场牟取暴利的目的。官僚资产阶级培养民营资产阶级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手段，利用民营资产阶级这个特殊的阶级为自己牟取巨额利润。今天他们的一些被公布的手段，任何一部贪污电影与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另一方面，是利用这个阶级，代替他们直接压榨无产阶级，而他们既可以转移矛盾，又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本坐收渔翁之利。根据中修数据，中国 70%的劳动者都在私营企业中，官僚资产阶级正在实行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官僚资产阶级正在成为一个最腐朽的金融资本食利者阶级。而民营资产阶级则是官僚资产阶级培养的一批寄生奴才。他们同官僚资产阶级在利益上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和官僚资产阶级保持着暧昧关系，对付无产阶级却十分坚决。

修正主义集团对私营经济采取了渐进式的承认，我们摘录中修的一段供认：

“第一阶段：从“不承认、不允许”到“看一看、等一等”，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消极限制到允许存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6 年底，党对私营经济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针，静观其发展，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基本政策，即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消极限制到允许存在。

二、第二阶段：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基本上单一鼓励到鼓励与管理引导相结合

1987 年到 1991 年，我国的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逐步加深，提出了“补充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基本上单一鼓励到鼓励与管理引导相结合。

三、第三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到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 1992年至200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突破和创新，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也更加深刻，逐步形成了“组成部分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到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
> 四、第四阶段：提出“平等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方针”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
> 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今，党提出“毫不动摇”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十六大报告明确表示“允许私营企业主优秀分子入党”，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政策和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和成熟，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形成“平等论”，在私营经济政策上由“方针”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讨论了民营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结合中修的供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民营资产阶级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补充的奴才地位。

企业的放权，掠夺的成全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经委）等6个部门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

中修教科书是这样概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

在1979年，国务院制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向全国推广企业改革试点。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允许企业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之余，生产销售计划外产品；二是企业盈利后，除了上交国家可以留一部分归自己。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扩权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的权力，以打破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其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我们看到，这两条完全恢复了利润挂帅的原则。“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也就是说，企业盈利了就多发工资，企业亏损了就少发工资。复辟的事实证明，企业盈利，工资上涨少，企业亏损，工资却下降快。

中修教科书是这样描述复辟的发展的:

到 1980 年 6 月，扩权试点企业已发展到 6600 多个，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 16%左右，产量和利润分别占 60%和 70%左右。1981 年 5 月 20 日，国家经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等 10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巩固提高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暂行办法》，将扩权探索规范化、制度化。

随着企业扩权改革的不断推进，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革新也愈发显得急迫。能不能在原有放权让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呢?

1984 年 3 月 22 日，在福州参加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 55 名厂长、经理，写信给省委领导同志，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厂长经理们向省委领导要五条权力：副厂长以下干部任免权；破除干部“终身制”和“铁交椅”；企业有权支配使用奖励基金；准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开展自销和协作；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1984 年 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88 年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厂长（经理）负责制作了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这部至今还影响着未经改制的国有独资企业的法律，相当大地强化了厂长（经理）的权利和责任。法律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企业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负全面责任。这部法律

也对党委和职工的民主管理作了原则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企业工会代表维护职工利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企业工会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这群厂长要“松绑”，实质上是要恢复一长制。

工人阶级的权利一经被剥夺，党内资产阶级就要夺取工人创造的一切。他们从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党内资产阶级，变成了实际上榨取工人血汗，并将所得装入腰包的官僚资产阶级。

而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实施一长制。

价格双轨制

复辟正在全国深入进行。“价格双轨制”是资本主义复辟深入进行时的一项政策。

“价格双轨制”的目的是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新在中国产生，官僚资产阶级好凭借复辟了的资本主义市场盈利。“价格双轨制”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重新出现。“价格双轨制”是一场混乱的抢劫，给中国的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价格双轨制”中出现的“官倒”，是官僚资产阶级抢劫人民创造的财产的狂欢。“官倒”使官僚资产阶级赚得盆满钵满，使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这一切，为“六四”运动的烈火，准备了干柴。

破坏计划经济后的混乱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被修正主义集团践踏后，修正主义集团所推行的一套利润挂帅的经济原则，不久就被经济混乱的事实所检验其是失败的。利润挂帅产生的混乱，恰为官僚资产阶级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复辟行径提供了借口。官僚资产阶级趁机倒打一耙，将经济上的混乱全部栽赃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头上，并由此得到应当恢复市场经济的结论。终于是为复辟之事找到了复辟之是。

修正主义反动文人供称，破坏计划经济后出现了以下“问题”：企业待遇不公，产业结构失衡，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补贴紧张。他们举例说，国营企业之间利润悬殊、工人待遇差距大；加工工业追逐高利润，能源原材料工业亏损；企业生产计划外产品、乡镇企业与个体户自由交易，导致“争原料”、“以小挤大”、黑市倒卖；政府补贴负担越来越重，直至难以为继。他们把所有乱象的根源归结为“价格不合理”，妄图用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投入产出模型和计算机程序，计算出“合理价格”，结果彻底失败。

这完全是修正主义集团的栽赃陷害！

这些所谓“问题”和乱象的根源，绝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而是修正主义集团丧心病狂地推行利润挂帅、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计划外自由交易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利润挂帅必然导致企业只生产高利润产品，放弃社会必需但利润低的能源、原材料等“短线”产品，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盲目生产。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规律在计划经济内部滋生蔓延的直接后果，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则是完全对立的。

“放权让利”后，企业可以生产销售计划外产品、乡镇企业和个体户自由交易，这些措施本身就是引进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竞争机制和投机活动的引狼入室的行为。国有企业奉行“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上游企业把稀缺原材料拿到黑市倒卖，下游企业虚报需求、倒卖指标——这一切都是资本

主义复辟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的必然表现。修正主义集团正是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逐步瓦解计划调拨、统一分配的基础，制造混乱，然后把账算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头上，为全面恢复市场经济制造舆论和“事实根据”。

财政补贴紧张，同样是他们破坏计划经济、引入市场因素后自己制造的矛盾。他们一方面破坏计划调拨体系，一方面又想维持某些政治价格，结果补贴越来越多，无法持续。这正是复辟派制造矛盾、然后用“市场化”来“解决”矛盾的典型手法。

修正主义集团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了复辟市场经济，使自己大捞一笔。他们先用利润挂帅等资本主义原则制造混乱，然后倒打一耙，把一切罪责推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头上，妄图证明“必须恢复市场经济”。他们成立价格研究中心，妄图用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来“完善”价格，结果彻底失败。这充分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绝不能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来“修补”。在革命胜利后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计划经济原则，彻底批判和清除利润挂帅等资产阶级法权，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中修材料供述：

第一，企业待遇不公。“放权让利”要求核算企业的收入、成本和利润，而长期僵化的计划价格早已偏离合理标准，企业提留利润时苦乐不均，产生很多抱怨。举例说，1978 年国营天津印染厂工人的人均积累（利润加税收）是 1.82 万多元，同属一工业局的天津四新纱厂只有 3638 元；天津轧钢行业工人的人均利润是 8559 元，而与之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只有 412.6 元；全国工业设备的成本利润率是 25%，农机产品的利润率只有 9%……这样悬殊的利润，使工人待遇出现差距，这种差距是国家对各种产品定价造成的。

第二，产业结构失衡。受利润考核影响，定价高的产品有企业积极生产，定价低的产品则没人生产，导致过剩与短缺并存。总体而言，加工工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能源、原材料工业。数据显示：1979 年，绝大部分能源、原材料行业的资金利润率都不超过 5%，而加工工业的利润率都在 38%以上，其中手表行业利

润率高达 61.1%，煤炭几乎全行业亏损。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定价不合理。结果是，加工业产品相对过剩，原材料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当时前者被称为“长线”，后者被称为“短线”，如何“取长补短”成为政府长期头疼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三，经济秩序混乱。企业自主权扩大后，可以生产销售计划外产品；乡镇企业和个体户出现，催生了大量自由交易；计划经济体系因此遭到冲击。由于乡镇企业不受计划控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自定生产，但它没有能源、原材料，只能通过高价甚至贿赂从国有企业获得，出现了所谓“争原料”、“以小挤大”等问题。而在国有体系中，企业也奉行“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原则。上游企业会把稀缺原材料拿到黑市上销售，尽量减少和不履行计划指标，下游企业则会虚报对投入品的计划需求，甚至把稀缺物资指标用于倒卖。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计划与实际不符、计划与计划脱节、计划与交易冲突的混乱局面。

第四，财政补贴紧张。在原有计划经济体系中，政府承担着几类价格补贴。首先是国有企业——譬如原材料生产企业，产品定价过低；外贸出口企业，为换取外汇必须亏损；产品滞销的企业，收入无法兑现。它们生产得越多，政府补贴越多。其次是农产品和农副产品，政府从农民手中收购，按计划价格出售给城市居民，也必须承担补贴。1979 年之后，由于农产品产量剧增，工业规模也在扩大，政府在这些方面支付的补贴越来越多，日渐难以为继。

所有这些问题和乱象，都指向一个根源：价格不合理。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从 1979 年到 1984 年间多次调整农产品和重要工业品的价格，并于 1981 年成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由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调集优秀专家，试图用计算机程序和投入产出理论计算出一套全面合理的价格体系。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直到 1985 年 5 月价格研究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理的价格”依然没有计算出来。）

双轨制的实施

中修文章说：

“1984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确定工业生产资料属于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和企业自销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的 20%的幅度内，企业有权自行定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1985 年 1 月取消了 20%的限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作为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被肯定并广泛推广。”

也就是说，同一种商品在国家的计划经济指标内有一种固定价格，在计划经济指标外有另外一种依照市场供需机制自由调节的价格。

中修材料供认：

改革方向应该是放弃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改革的办法是实行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即：先将计划额度固定下来不再扩大，全部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即承认计划外产品交易价格的合法性），然后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

双轨制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彻底复辟的前奏。

· 官倒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以人民的苦难为地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养肥了一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在“价格双轨制”施行后，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提前掌握市场信息，亲自或让和自己亲近的人进行倒买倒卖活动，即“官倒”。这样，不仅官僚资产阶级捞了一笔，还产生了一大批新兴的资产阶级和食利者寄生虫等。

中修材料供认：

> 计划外物资的交易合法化衍生出“官倒”现象，并使原有计划生产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由于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人通过权力获得计划资源，拿到市场上出售获取暴利，成为让群众强烈不满的“官倒”。1988年，普通钢材的计划价格是每吨700元，市场价格是1800元。这种情况下，生产企业不愿按计划合同供货，即使签了合同也以各种借口不履行，而是尽可能将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下游企业则必须支付额外的补偿才能得到计划供货。

中修在官倒盛行时，疯狂叫嚷“反腐”。然而，中修是不会自己反对自己的。所谓“反腐”，无非是中修内部的利益斗争。

中修《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坚决惩治“官倒”》是这样叫喊的：

> “有色金属倒，黑色金属也倒，木材、农药、化肥、汽车、彩电、冰箱……什么东西紧俏，他们就倒什么，什么东西钱来得容易、来得多，他们就倒什么。直倒得物价腾飞、市场动荡……要真正拿出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勇气来。小‘官倒’敢治，大‘官倒’也敢办它。”

然而，无数的事实，映证了修正主义集团“反腐”的虚伪实质。我们就举“康华公司”这个典型，来看看中修的反动本性。

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是1988年3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公司，派生自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现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前身是1984年9月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投资600万元，中央计委拨付500万美元，由邓朴方（邓小平儿子）建立的康华公司。

“康华公司”及其母体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头子，邓朴方手下的管理人员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中下层管理干部也百分之百是凭关系进来的。无论是小康华时期还是大康华时期，总公司、二级公司和外地分公司使用了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撵下台的干部和退居二线的高干（国务院部委司局长以上的干

部，地方副市长以上的干部），以及当时的现行高干子弟。（邓朴方是董事长，王鲁光（王树声之子）任副董事长，俞正声（黄敬之子）任总经理。）因此这个公司能量惊人，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有康华的一杯羹，国务院有什么部委，康华就有什么公司，有些部委撤消精简下来的公司，康华都捷足先登收入旗下。

很多从国家部委到康华任职的干部，都把生意做回了原系统。如石油部出来的，在康华继续干石油生意。跑陈幕华那里公关，建起了康华自己的金融机构和租赁公司。最后连保险业和民航业都想干。（被国务院制止了）。还想在山东和日本合资一家相当于宝钢规模的钢铁公司。（冶金工业部认为不妥，才罢休。）

康华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它就是一个专门搞官倒的公司。“康华”在顶盛时已拥有二级公司 58 个，三级公司 113 个，惊人地“兴旺发达”，多数从事流通领域经营，倒买倒卖，包括倒卖外汇，逃汇套汇，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偷税漏税。

由于受到群众的压力，康华公司于 1990 年被裁撤。但是，高干子弟们已经又捞了一笔。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越发兴旺发达了。（邓朴方、王鲁光、俞正声几个罪犯此后不断高升）

官倒等一切现象证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极度混乱的。中国的复辟进程是极为剧烈的。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推行白色恐怖，使他们的复辟行径得以实现。而他们的复辟行动一旦失去障碍，他们便开始疯狂地将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口袋。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路线，原因仅仅是这条路线有利于他们自己。

利改税

“利改税”是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项政策。“利改税”（国营企业原来向国家上交利润的大部分改为征收所得税）的施行，导致

国企大量被破产，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创造的财产大量流入官僚资产阶级的口袋。这一切使通货膨胀加剧，使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

中修文章供认：

> 按利改税第一步改革执行的结果，国家所得占 61.8%，企业所得占 38.2%（用于生产发展基金、职工集体福利基金和奖金），这就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

也就是说，利改税的实行，使国企要在市场上竞争同时，扣除 70%左右的盈利，交给国家和工人。当时私企、外企的综合税率只有 17%33%（本身税就低，还有各种减免），而国企的综合税率却在 70%-80%。而私企的金主正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通过使国企破产等方法重组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更重要的是，国营企业承担着工人的一系列福利保险责任，而私营企业却可以野蛮发展、没有约束。强加重税必然导致国营企业收支恶化。修正主义集团正是利用这一点，制造“国企亏损”的假象，为后来的“砸三铁”、大下岗和私有化创造条件。 他们先用利改税等政策让国企背上沉重负担，然后倒打一耙，说国企“效率低”、“包袱重”，必须“砸烂铁饭碗”，把工人赶出工厂，把国有资产廉价转让给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私企和“承包者”。这完全是官僚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连贯逻辑：先破坏，后“改革”；先制造问题，后用资本主义办法“解决”问题。

官僚资产阶级的复辟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通货膨胀迅速发展。

中修文章供述：

> 1983 年开始的这次税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税制的整个面貌。使我国初步建立了适应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税收制度。

改革（利改税）的结果却出乎意料。第二步利改税出台伊始就立即出现了信贷、投资和消费基金的三重膨胀，并由此引发了政府财政收支的恶化。信贷、

投资和消费基金出现了失控状态，并导致了 1985 年的物价出现了 8.8%的上涨。随后，从 1985 年下半年开始，政府的财政收入连续 22 个月下滑，1987 年开始出现财政赤字。

利改税并没有真正解决经济责任制的根本问题。1986 年 12 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决定停止利改税试行办法,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制度。

企业的物质刺激

1980 年代的中国，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为了转移工人的注意，淡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巩固复辟的政权，采用了物质刺激的方法，通过一碗红豆汤，使工人阶级出卖长子权。

物质刺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受到了批判。当时的物质刺激的形式是：用“钱”来“刺激”工人、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劳动达到某个标准就发奖金。当时的工人革命派说，物质刺激就是要把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的产业工人，变成自私自利的小生产者，妄图使工人得了奖，忘了党；拿了钱，丢了权。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物质刺激，有些还是工厂管理层为了提高产量所帮的倒忙，那么，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后的物质刺激，就完全是为了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欺骗工人中立，以巩固复辟的政权这个罪恶的目的了。

改革开放后的物质刺激，就是在复辟伊始不顾实际地超发工资和奖金，实行工人子女接班制度等福利政策。而这样做的恶果，就是使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官僚资产阶级并不是真正希望工人阶级能过上好日子的。不过几年，他们便通过各种手段将工人赶出了工厂。而工人阶级也终于尝到了出卖长子权的苦果。

有材料讲：

1984 年职工工资上涨同比增加 19%。80 年底初期的工人回忆说，“那个时候的生活真好，我买菜从来不问价格。下了班就整两个卤菜，喝点小酒，神仙日子。”

工资的不顾实际的超发，使财政上的赤字增长，而财政上的赤字增大，却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而这正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加剧。

尽管老工人大部分觉得企业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但国家实行了子女顶替制度和干部退休制度的政策，以替老工人解决下一代青年就业为名让子女顶岗代替，让一批反对改革的老工人离岗退休到二线。全国办理退休制度 1225 万，其中子女顶替 900 万，占 80%。这个阶段上，家家户户都有失业的，很多工人子女没工作在街上耍，但如果退休，不但自己发全额工资，孩子还有工作，不再当流氓，此外当时乡镇企业大发展，老工人有手艺，退休后再去乡镇企业或去个体户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这是对老工人的收买，中修先用物质刺激和子女顶替收买一部分老工人，削弱工人阶级反对复辟的力量，然后再对整个工人阶级下手，砸三铁、大下岗，把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争得的铁饭碗彻底砸烂。

中国 1980 年代的通货膨胀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恶性疾病永远分不开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了它们不搞通货膨胀就活不下去。搞通货膨胀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的、长期的政策，而且只能越搞越厉害。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自从资本主义一步步地在中国复辟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也悄然地开始在中国发挥它的作用。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又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

1980 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直接原因是中修政府盲目扩大信用。而之所以信用被盲目扩大，原因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

中修教材是这样供认的：

> “1984 年第四季度中国出现经济过热后，国家曾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的供求失衡矛盾，但财政、信贷“双紧”政策仍然没有有效制止通货膨胀，到 1988 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严重波动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物价急剧上涨。

1985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543.19 亿元，比 1984 年增加 710.1 亿元，增长了 38.7%，到 1988 年急剧增加到 4496.54 亿元。由于工业发展过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旺，使得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1985 年到 1988 年，银行各项贷款平均每年增加 1533 亿元，增长 24.3%，货币投放平均每年增加 336 亿元，增长 28.1%。其中光 1988 年货币投放新增 680 亿元。“这一时期，居民的人均收入有了显著增长，使得消费需求的各项指标的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

投资需求的膨胀和货币投放的过多，引起消费品和生产原材料供应紧张，导致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由 2.8%急剧上升到 1988 年的 18.5%。就 1988 年来说，1 月份零售物价总指数涨幅为 9.5%，2 月份上升到 11.2%，到 7 月份已提高到 19.3%，并造成了一度的抢购和挤兑潮。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秩序势在必行。

对于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党和国家力图探索新路子加以解决。为防止急刹车引起的损失和震动，1985 年初，中央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即用比较缓和的办法逐步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恢复平衡。1985 年 2 月至 10 月，国务院先后四次召开省长会议，以解决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和信贷规模过大，外汇使用过多以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问题。主要措施是紧缩银根，控制货币投

放。这次“小调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地方和企业投资尤其是非生产性投资、消费基金尤其是集团购买力压不下来，主要压缩的是企业流动资金，引起经济增长“滑坡”，反而影响了供给。政府不得不适当放宽货币控制。”

可以看到，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恢复企业的利润原则，同时放开市场，企业为了利润，疯狂地无序地扩大再生产，由企业投资造成的社会总需求不断增长，信用不断扩大，致使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产生财政赤字。同时，又给予工人不切实际的工资，搞物质刺激，加剧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最方便的办法是发行纸币或发行国债，而大量发行纸币，纸币没有能代表的产品，导致纸币票面价值贬值，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物价上涨。

1980 年代的三次通货膨胀，无不是由于这些原因。

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后果，永远都是富人愈来愈富，穷人越来越穷。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的通货膨胀，无不使资产阶级赚得盆满钵满，无产阶级落得家破人亡。1980 年代的通货膨胀，使官僚资产阶级在“官倒”中赚得更肥了。然而，无产阶级的生活却因为通货膨胀而日益恶化了。

翻开历史数据，我们能看到，1980 年代末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程度高于工资上涨程度，实际工资绝对降低了。从 1987 年到 1988 年，物价上升了 18%，但是工资从 1985 年到 1990 年仅上涨 12%。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印证了列宁：“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的论断。

中修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上供认：

> “全会要求，治理整顿必须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持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解决好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特别是要迅速在全党全国造成一个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齐心合力把农业搞上去，确保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三是，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量清理整顿各种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克服生产、

> 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下功夫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科技水平，走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发展路子。”

这是中修政府不准上调工资的罪证。它赤裸裸地暴露出，所谓的“治理整顿”，实质是“劫贫济富”。

1980 年代末的通货膨胀，是复辟的必然恶果。这次通货膨胀，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生活日益恶化，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欠下了无数血债。而这一切，直接引发了“六四运动”。

1989 年社会群众运动

1980 年代末的通货膨胀，是复辟的必然恶果。这次通货膨胀，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生活日益恶化，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欠下了无数血债。而这一切，直接引发了“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后，人民的第一次发动。六四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场运动中，学生是先头部队，工人群众是运动主力。由于参与运动的工人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是造成苦难的真正原因，缺乏明确的纲领和先锋队的领导，仅仅自发而没有自觉地组织起来，所以，工人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去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运动被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血腥地镇压了。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质，决定其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统治，必须实行法西斯专政。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六四反革命罪行，证明了这一点。

六四运动宣告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梦在中修统治下彻底破灭，它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只能用有组织的革命对抗有组织的反革命，用革命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

这就是六四运动给我们的教训。

1989 年的春天，北京的大学里，思想正在碰撞出火花。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后，官僚资产阶级为了制造适应复辟的理论，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推翻，引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书籍封存毁坏，却广泛印刷资产阶级故纸堆中的垃圾。

随着官僚资产阶级上台并执行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以来，在这条资本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一大批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从社会中产生出来。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一部分成为了有不同政见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的主张虽然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冲突，但是在复辟后的中国，他们仍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1989 年，北京的大学里，学生纷纷组织沙龙等讨论时局的活动，异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在各大高校内发表演讲。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逝世，当日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献花，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日，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 月 16 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胡耀邦在八六学潮中，对学生运动并未采取武力镇压，保护了一些学生。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非法西斯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态度，然而，对于采取法西斯专政的官僚垄断统治集团来说，他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底线。1987 年，他被迫下台。

胡耀邦并未镇压学潮，而且下台不到 800 天即死亡。他的死成为了导火索，引燃了看到社会弊病的学生，进而引爆了饱尝复辟苦果的工人阶级。

在部分学生主导下，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

4 月 17 日，随着悼念活动的发酵，北京集会人数激增至数千人。北大和人民大学等院校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示威，并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信，提出了七项要求：

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 .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3 .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4 .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5 .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 .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7 .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4 月 18 日上午，数千名学生聚集在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谣言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校园里的学生，许多学生决定加入抗议活动。这段时间中，作为先进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并发布了传单。（有关工自联的传单，同志们可以搜索一本名为《工人自治联合会运动 1989》的书）

4 月 21 日至 4 月 23 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在 4 月 23 日，另一个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成立，随后高自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

工自联和高自联，是资本主义复辟后，诞生于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

由于受到了资本主义复辟后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参与运动的工人们并没有明确认识到，法西斯专政是官僚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官倒，通货膨胀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后果。因此，工自联的纲领并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只能提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而由于没有严密的革命理论，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形成严密的革命组织。而正因如此，六四运动在遭到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的暴力镇压时，工人群众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撤退。

4 月 24 日，北京 35 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4 月 25 日，北京 43 所高校约 6 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高自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应才会复课。这三项要求是：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2、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

4 月 26 日，在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的头目们商议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

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官方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了更多学生团结起来，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 4 月 27 日集结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游行学生的口号是“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强调会继续“拥护共产党”。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 月 29 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代表。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议题。中修耍起了“假谈判，真倒算”的阴谋，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表态拒绝出席。

5 月 4 日，学生再次游行，并有 500 名新闻工作者参加。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在 5 月 3 日至 5 月 4 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认为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说“事态将逐渐平息，中国

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谈到处理方式的时候说“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

先进的学生不能容忍群众被中修的假和谈欺骗，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进行绝食抗议。5月13日，北大和北师大约500名学生于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政府与学生对话，促进民主化进程。5月14日，为顺利接待戈尔巴乔夫，政府与学生对话，学生要求中央承认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定性，而社论作者正是中修头子邓小平。邓修集团暴露了他们反动的真面目，他们拒绝修改他们的反动结论，谈判就此破裂，学生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激起中国人民支持学生的运动，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参与者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

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学者季羡林等参与签名。首都新闻界的游行人士开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横幅，人民日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讽刺新闻审查制度。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民盟）、孙起孟（民建）、雷洁琼（民进）、周培源（九三）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根据新华社报道，七十七岁高龄的著名学家季羡林亲身前往广场探望学生，在学生的搀扶下一步一颠地走进绝食学生中，拥抱着仰卧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横幅写着“学生爱国，我爱学生！”数学家陈景润和王元共同疾呼“学生们的负担太重了，让我们承担一些吧！”歌唱演

员李谷一、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学生的指挥中心，她们 30 多位政协委员到此是为呼吁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督促政府尽快对话。

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表明态度在博物馆楼顶升起在运动中具有象征性的 V 字手势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亦组成队伍手持横幅走出故宫表达对绝食学生的支持。游行中罕见的出现了往来不参与社会运动的宗教人士，佛教的和尚举起“金刚怒目大雄无畏”“弘法自由广度众生”等标语，基督新教的基督徒、神职人员与神学院教职人员亦在游行中举起十字架，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穆斯林举起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支持学生，并借此表达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诉求。北京市数十间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穿白大褂参与游行，并志愿为绝食中身体不适的学生提供救助，一些医生在劝导学生过程中激动落泪；包括首钢、东风、吉普、铁道部等在内的各产业和组织及大中企业的工人参与游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车，周边县区的农民更乘坐农耕载具组成车队前往市中心参与游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北京市有公安干警志愿前往广场为学生派发饮料，也有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人员的游行队伍沿途游行向群众比 V 字手势，赢得群众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现场声援；中国警官大学的 700 多名学生 18 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中小学生亦参与游行，并有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条心”等口号。

随着媒体报道限制的打破，广播电视报纸在这一刻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 月 17 日到 19 日这段日子也被评价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而央视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职工亦组成人数庞大的游行队伍前往长安街游行，并且拉起巨大的横幅，点名要求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兼央视台长艾知生辞职；而人民日报 5 月 18 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为标题的新闻，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并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而人民日报社过千名职

工也参加了游行，其中不少在新闻届有名望的高级编辑记者亦在其中；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

面对群众的怒火，中修决定用法西斯专政抗压。

5 月 20 日，中修国务院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 5 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 30 个师的兵力，多达 250000 名士兵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工自联还组织了“纠察队”，发动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军车。

解放军军人一开始接受的命令是“保卫中央，保卫北京”，但这一虚伪的命令随着军队进京的第一天便被群众的劝说戳穿了。抗议群众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一些士兵选择站到人民的一边，他们加入人民的队伍。一些士兵选择站到他们认为的“共产党”，即官僚资产阶级的一边，他们有人打死了群众，群众奋起反击，烧死了杀人凶手。

事情正在起变化。

军车队伍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并且被阻止进退，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在部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且正在发生分化的情况下，中央军委于 5 月 24 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换下军队内部的“动摇分子”。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5 月下旬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一致的活动，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同时伴随着天安门广场上聚集著大量群众使得示威队伍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进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学生运动的发言人，但是遭到学生团体的反对。另外一方面王丹则认为近期中国政府将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活动，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

方式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个派系也开始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并趁机将他们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获得支持。学生团体开始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这包括有勾结政府成员并且试图借由学生运动以获得个人成就。

可以看到，运动没有坚实的组织作为基础，是运动不能有效聚集力量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6 月 2 日，随着学生抗议运动增加，工人串联准备发动罢工，中修高层决定以武力解决运动。同日，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

6 月 3 日下午 4 时 30 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 3 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刽子手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

在经历了六月三日的血腥夜晚后，天安门广场被清理干净。

6 月 4 日白天，北京有零星枪声传出。由于后来中国官方对该事件讳莫如深，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当晚的清场行动至今不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 年第 11 号）所提供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武警及警察有数十人被害，6,000 多人负伤；非军人有 3,000 多人受伤，200 余人死亡，包括 36 名大学生、医护人员、群众。

在运动中，部分军人拒绝向人民开枪。由于运动的无组织无纲领，这些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被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清算。

第 28 集团军 6 月 4 日早上在木樨地被群众包围，士兵在受到市民源源不断的质疑和哭诉，并目睹北京市面的情景后，军心动摇弃车不顾，整支部队就此停滞不前。受 28 军的状况影响，戒严部队指挥部派遣直升机到西长安街上空督战，用高音喇叭呼喊 28 军受阻就坚决反击，结果被 28 军的高射机枪扫射

将其驱逐。下午五点整支部队撤走，28 军成为唯一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因“执行不力、指挥错误”被降级调任。

天安门广场上，自由女神的倒下，象征着在中修法西斯专政下，人民群众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可能被彻底摧毁。

六月四日中修的反革命暴行，在各地掀起了余波，由于群众没有路线与组织，最终被镇压与清算，全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六四运动后，6 月 9 日，反革命头子邓小平洋洋得意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指出，“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

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的这番讲话，赤裸裸地暴露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他们知道，一旦真正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他们复辟的罪恶将很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统治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因此，他们绝不会主动放弃法西斯专政。邓小平把参与运动的群众称为“造反派”，正是因为他把任何群众起来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复辟的行动，都视为对他们法西斯专政的致命威胁。

六四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官僚资产阶级绝不会主动放弃法西斯专政。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只要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就不会存在。群众只有在拥有革命纲领的先锋队的领导与组织下，才能达到解放自己的目的。

官僚资产阶级为了制造适应复辟的理论，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实质推翻，代之以披着马列外衣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得人民认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丑化文化大革命，使得人们认不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工自联、高自联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所以提出的社民性质的工人自治诉求、也没有形成严密的革命组织。但工人至少还没到支持市场化自由化的地步，没和学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合流，这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教育群众的成果。

当时先锋队要做的就是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应该是要揭露当局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质，纲领应该是恢复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对于自由派可以联合，但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民主去把他们那边的人争取过来，要取得主导。如果当时无产阶级拥有自己的先锋队，其实完全有可能打倒走资派，重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民主，可惜历史容不得设想。

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愈发尖锐。社会生产关系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虽然客观上存在这样的可能，但是，无产阶级在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在主观上完全不需要在其中横插一个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工人阶级有力量独立完成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

自由女神虽然倒下去，革命女神将又站起来。

计划与市场的论战

六四运动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关于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论战。

参加这场论战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两派。市场派要将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到底，把中国彻底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计划派则在资本主义复辟应不应该进一步激进地推进的问题上裹足不前。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回到社会主义，而是想维持80年代那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局面，继续用计划手段控制经济，同时保留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他们害怕进一步市场化会打破现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害怕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中自己被边缘化。计划派不久发现，市场派推行的彻底复辟能够让他们通过权力直接转化为资本、通过“官倒”和关联交易大发横财，他们便立即放弃原来的立场，一窝蜂地转向支持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鸟笼派的主张在实践中迅速破产，绝大多数原鸟笼派官僚都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和积极推动者。因此，这两派并没有本质的矛盾。他们的矛盾，仅仅体现在复辟方法的选择和速度的控制上。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鸟笼派”与“市场派”之争，绝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在如何最稳妥、最有利地实现和巩固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上的策

略分歧。一旦彻底市场化对他们的权力和财产更有利，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任何“计划”外衣，全面投向资本主义复辟。

与此同时，党内和社会上还存在一批更倾向于抵制彻底市场化的“老左派”力量。他们通过《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刊物，发表文章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主张维护一定的计划调节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这些老左派在六四后一度有过一定影响，但最终被官僚资产阶级逐步压制或收编。他们提出的主张虽然在反对激进市场化上有一定作用，但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纲领和群众基础，未能有效阻挡资本主义复辟。

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复辟倒退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邓小平在这一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南方谈话说明，邓小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要将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贯彻到底。

中修材料供认：

>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发表一篇文章贺新春。从1991年2月15日（正月初一）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强调发展经济、推进改革开放的观点。

第一，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当时舆论环境下，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第二，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即把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等等。

第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封闭僵化观念。文章提出：“90 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等，“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第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强调，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

对于很多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皇甫平说了什么话，而是皇甫平是个什么人。行家一望而知，这只是一个笔名，是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这是一个三人小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评论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至少有一个人，当时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心里明镜似的：这三人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邓小平。他们文章中那些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都是邓小平说的。其实，只要你稍有政治经验，就算没有机会亲耳聆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出一点蹊跷：看看当日中国南北所有那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能够这样来谈论改革、谈论国家意识形态纠纷的人，除了邓小平，还有谁啊？

这篇文章发出后，立马受到了计划派的反对。邓小平为首的市场派，也旋即进行了反驳。计划派和市场派两伙强盗为了“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吸中国人民的血汗”而内讧起来。

内讧的结果，是市场派赢了。

中修材料供述：

1992 年 2 月 4 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方报纸，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

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1992 年 10 月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成为了这场内讧的结局。

1992 年到 2012 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深入的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其代价是劳动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大发横财。劳动人民日益恶化的购买力同资本主义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时尤其清晰地表现了出来。而这一矛盾，直接后果是国内市场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正是经济危机的前提。为使经济危机尽可能晚些到来，中修政府不是提高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以扩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中修政府一方面砍掉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福利制度，把住房、医疗、教育等原本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领域推向市场，使劳动人民不得不用有限收入和长期债务承担生活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和对外出口，为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寻找出路。这一切实践说明，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早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为了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中修政府不仅强行扩大内需，还向海外扩大市场。中国从 1996 年左右出现生产过剩，同一时期，中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并将其放在“引进来”之上。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这成为中国彻底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标志。然而，这一切都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表现即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中国的对外出口下降，扩大内需成为了中修政府的唯一选择。作为应对方法，2008 年中国启动了四万亿计划，通过扩大政府赤字，超发信用的办法，给经济打强心剂。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实际运用。中修通过给经济打强心剂，成功地延迟了经济危机的来临。然而，凯恩斯主义只能作为一剂副作用极强的强心剂起作用，而它的副作用，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滞胀危机。而今天的房地产泡沫，正是当年打凯恩斯主义经济强心剂的后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二十年间，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人民的反抗斗争，正在一天天地成长。从孟连到池州，从石首到乌坎，英雄的富有斗争精神的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战斗。其中，安徽登封的马毛党成为了中国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支先锋队。江西丰城的农民运动为首的中国农民运动成为中修被迫取消农业税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们将详细梳理 1992 年至 2012 年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巩固

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关键。

国企改革是一场浩劫，改革洗劫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社会主义财富，而改革的赃物被尽数收入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囊中。

国企改革是被强制推行的，国企被官僚资产阶级故意破产，而官僚资产阶级又借口国企经营不良，将工人阶级创造的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收入麾下。

国企改革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广泛地抵制。然而，由于工人的自发行动缺乏先锋队的自觉领导，往往遭到失败与镇压。

关于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修材料是这样讲的：

随着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逐渐面临严峻挑战。到 1997 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比 1987 年上升十多倍，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和退休金。1998 年至 2002 年，国企改革在三方面实现了突破：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公有制序列；通过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5000 多户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通过再就业中心和基本保障线政策，托管、安置了近 3000 万下岗职工，建立了国企职工可以流动的机制。

国企改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国企改革中所谓“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实际上是将曾经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遗产收入私囊。而随着这些企业的被破产，一大批优质的机器，厂房等被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官僚资产阶

级从中大赚一笔，他们有的倒卖机器，有的干脆自己或让家人朋友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开工厂，从而又制造了一批新资产阶级。

中修不得不供认，许多官员从国企改革中“侵贪国有财产”。

中修喉舌新华网交待了一些事实案例：

> 万华置业股份公司总经理冀党生在1995年至1998年间，利用担任国企领导之便，打着国企的名义注册多个公司，通过几次改变法人，将公司操纵在个人手中。1999年10月，他采取虚假手段将万华公司中的71.6%折合人民币两千余万元股份转到个人控制的3个公司名下侵吞。原机械工业部经济调节与国有资产监督司企业财务处处长、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陈洪喜在1997年4月至1998年7月间，趁机械工业部撤部建局，利用掌管账外资金的职务便利，将其掌管的机械工业部账外资金近两千万元转移并购买国债盈利。调离原岗位进行业务交接时隐匿不报，日后予以侵吞。

事实上，这些仅仅是小巫，而大巫们——即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头目——所私有化的国家财产更是不计其数。坐拥24亿人民币存款的炫富高干子弟，以及被整下台的周永康，都是其中的例子。这个官僚阶级，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自己积累了千年也用不完的财富。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个别的贪污腐败，而是作为政党来掠夺、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为了达到永远骑在人民头上吸血的目的，他们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

大下岗

所谓的国企改革，无非是修正主义集团用强制手段剥夺工人的权利，来达到他们发家致富的目的的手段罢了。而随着国企改革来到的下岗潮，是修正主义集团犯下的又一罪行。

对于 90 年代的下岗潮，中修官方对此缄口不提，仅仅这样在百度百科上供认：

自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一直面临改革开放以后所带来的种种冲击。进入九十年代，大量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三角债频发。在此关键时候，国有企业重组也就成为必然，进而引起重组后各企业大量裁员的下岗潮。在当时虽然引起部分下岗职工的不满，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企业的发展却是非常成功而且影响深远。不过在此过程中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也非常多。

下岗是一种变相的失业。

下岗工人这样控诉：

虽然工人失去工作，但仍挂属于原单位，且没有工资。若自行离职，则得不到劳动补偿。因此大量下岗工人因有长工龄，不希望连补偿也失去。所以多数下岗工人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多数工龄补偿为一至十万，有部分国企拖欠工人补偿，也有用解散为借口不给与下岗工人任何补偿。

下岗的具体人数，一位叫做“元淦恭”的作者是这样统计的：

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在全国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不过，我们可以查阅当时的一些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管窥其规模。鉴于下岗潮主要影响的，是当时面临转型、改制乃至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此分析下岗潮可资参考的数据，就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下称“职工总数”）的变化。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数的减少数（下称“职工减员”或“减员数”），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下岗失业人数，但总体是和下岗失业人员总数较为接近的数据。1996 年以前，中国职工总数一直保持在 1.4 亿以上，基本保持稳定。但 1997 年，职工减员 333 万，1998 年一年又断崖式减员 2906 万。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全国减员数达到 3239 万，相当于 1996 年职工总数的 22.7%。从 1998 年到 2002 年，下岗潮还在持续。到 2002 年，职工总数比 1998 年又少了 2736 万，降幅是 24.8%。从 1996 年到 2002 年，短短六年间，职工总数减少了 5975 万，较 1996 年水平净减少 41.9%。透过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的统计年鉴，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全国各地“下岗潮”的面目。网站上的年鉴最早收录到 1999 年，因此我能查到的最早的分省职工数据只到 1998 年。观察

1998 年到 2002 年四年分省职工减员数，会有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发现。…………

也就是说，接近二分之一的工人被修正主义集团强制失业，而在东北，这一数字更加触目惊心。

大下岗是工人阶级的灾难，由于国企改革，多少工人家破人亡，多少工人背井离乡！

官僚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工人赶出工厂，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将工人的权利剥得精光，让工人彻底沦为雇佣奴隶，这就是国企改革的实质。

工人福利被强制取消

一系列的复辟政策，导致的劳动人民生活的日益恶化，购买力日渐下降。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又使产品日益增多。本来，如果将产品分给工人，或者将工人的工资提高，都可以使过剩的产品得到消耗。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言，“当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个规律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因争夺殖民地而发生冲突和战争），如果资本主义不向落后国家，不向拥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国家输出资本也能发展，如果“宗主国”的过剩的资本积累不是用于输出而是用来大力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最后，如果这些过剩的资本是用于提高全体工人阶级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这样，那就无所谓对工人阶级加紧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日益贫困化，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加紧压迫，以及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了。如果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为此，官僚资产阶级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不愿真正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它们通过市场化改革，把原本由国家承担的一部分生活保障，转嫁到劳动者个人身上。这样一来，劳动人民成为了“消费者”，被迫用更高的生活成本、更重的家庭负担和更长久的债务，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强制取消福利分房，是修正主义集团的又一次犯罪。

早在 80 年代末，中修便将土地使用权商品化，使土地沦为地方资本运作的筹码。1994 年分税制改革大幅集中了中央财权，却将庞大事权留在地方。财政上的亏空，迫使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形成了地方政府贱卖工业用地吸引资本，换取 GDP 增长，同时垄断并高价出让商住用地，将招商引资的成本通过高房价转嫁给底层群众的财政逻辑。

中修材料供述：

> 1998 年后，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作出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指定“住宅产业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启动居民住宅消费。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仍存在一定数量的私有自住房，法律上也承认公民对房屋的所有权，但住房并不是普通商品，而主要是作为社会福利和单位保障，通过国家和单位分配取得。1982 年以前，城市房屋及其相应地产权利并没有被法律条文宣布为国家所有。直到 1982 年宪法颁布，才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形成后来城市土地国有、房屋权利相对分离的格局。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这一主要制度安排下，住房并不是作为普通商品由劳动者在市场上自由购买，而主要是作为社会福利和单位保障，通过国家和单位分配取得。

1996 年，中国的经济开始由需求大于供给变为供给大于需求。而 1998 年的过剩危机的根源，是群众购买力实际上在不断下降。

1998 年，中修全面废除住房福利制度，将劳动者的基本居住需求强制推入市场。群众不仅被掏空了储蓄，更被套上“按揭贷款”的金融枷锁，沦为地产与金融资本的长期债务奴隶。住房制度改革从这一时期起，开始成为福利市场化、土地财政扩张和居民债务化的重要环节，为后来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危机埋下了基础。

农业问题

双轨制的结束和市场定价的逐步确立，加深了包产到户后小农经济的危机。

1980 年代前期，粮食并不是完全通过自由市场流通。在这一阶段，粮食的流通仍然受到国家征购、合同定购、保护价收购等制度的支配。1980 年代前期农民收入的短期提高的短暂的“好日子”，并不是小农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积极性、更有效率，而是中修为了瓦解人民公社、稳住农村局面，采取的一种政策性让利措施。中修通过暂时减少统购基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部分农村集市贸易，换取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支持。这种让利从一开始就是暂时的，一次性的。是想让农民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

这个时期结束后，小农经济的危机便迅速显露出来。1985 年，中修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表面上改变了收购形式，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行政控制。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入双轨制轨道，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价格开始大幅上涨。这样，农民一方面仍然受到国家粮食政策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被逐步放开的资本主义市场推向深渊。

在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并存的状况下，计划内低价农资并没有稳定地落到农民手里，而成为了中修基层官员、流通部门和投机分子截留倒卖、寻租索贿的对象。农民实际面对的，不是稳定的计划供应，而是农资价格暴涨、垄断买难和层层加价。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很快超过了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种粮所得的微薄收益被农资成本渐渐吞没。剪刀差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重新出现。

到 1990 年代后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跌，农业收益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人民公社解体后，政社合一体制被拆散，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财政依托。中修基层政府机构为了维持自身运转，在得不到充分财政供养的情况下，通过“三提五统”、集资、摊派、义务工、教育附加、道路建设费等方式，把财政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这种负担是人民公社瓦解后，农村财政基础被破坏的必然结果。有些地方农民实际负担达到纯收入的15%—20%，越是贫困、越是依赖农业的地区，负担反而越重。1997年以后，农民纯收入不但没有继续增长，反而出现绝对减少。上面反复提出“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但农村市场始终扩而不动。占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19%的份额。被榨干的农村，不可能形成有购买力的市场。

在这一时期，个体小农既要承受资本主义市场中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打击，又要承受农资暴涨和基层税费摊派的压榨，种地越来越无利可图。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愿困死在土地上，只能流向城市，出卖劳动力。农村的土地或者低价流转给农业资本，或者被粗放经营，甚至大片撂荒。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水利和基础设施，也在集体组织瓦解后，由于长期失修而逐渐损坏殆尽。2000年全国夏粮大幅减产9%的危机，是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恶化的直接反映。

事实说明，“三农问题”并不是所谓“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而是集体经济制度被破坏、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农资垄断涨价和中修基层财政剥削共同作用的结果。包产到户后的个体小农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稳定的小商品经济，而是被国家收购制度、农产品价格、农资市场、基层税费和资本主义竞争共同支配的脆弱经济形态。

这种经济形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老一代小农被迫转化为第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子女进一步汇入城市产业大军，成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重要来源。中国农业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推向了资本主义经营道路。

让我们来看一段中修材料的供述：

> 八十年代初，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农民得到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连年丰收，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大部分仍以农业生产为主、特别是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却减缓了、停滞了。1979至1984年的四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1985至1988年增长幅度下降为5.1%，到了1989至1991年就只剩下1.7%了。

1992 至 1996 年因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收入增长又有所提高。但自 1997 年以来，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 30%以上，以务农为主的中西部农民这四年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虽然上面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实际上 1985 年以后，农民负担就逐渐加重，有的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占了纯收入的 15%－20%。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就越重。1997 年以后，农民的纯收入非但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997 年以后，国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实际却是扩而不动。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占人口 70%的农民只购买了 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了 19%的份额，农村市场怎么开拓？新闻媒体报道，许多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却无钱入学，呼吁社会救助。这位乡党委书记在信中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由于农民苦、农村穷，结果就是“农业真危险”。在许多地方，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死也要死在城市，纷纷外流了，组织生产的干部们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土地撂荒，种了也不好好管理。种田要赔本，谁还愿意种？2000 年全国夏收粮食减产 9%，秋季又大旱，秋粮大幅度减产。好在前几年还有粮食库存，还能稳得住，那么，再过几年真要是粮库空了，粮价飞涨，城市社会怎么能稳得住？在这种情势下，农业能不危险吗？

农村的市场化复辟，是由农民阶级的苦难铺就的。

延迟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它的表现，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

正如上文所言，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从根本上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归还给劳动人民。它当然可以在工人阶级斗争压力下、在危机威胁下、在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下，采取提高工资、扩大福利、国家干预、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等改良手段，暂时缓和矛盾，甚至把一部分过剩产品以各种形式分配给劳动人民。但是，这种让步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而是资产阶级为了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而采取的策略手段。

这是因为，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生产的目的就不是满足人民需要，而是追逐利润。改良可以暂时扩大一部分购买力，却不能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可以暂时推迟危机，却不能取消生产无限扩张同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缓和阶级冲突，却不能改变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

当国内市场无法消化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时，资产阶级通常会把目光投向国外，通过扩大出口、争夺海外市场、输出资本和控制资源，把危机向外转嫁。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市场、原料、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相互争夺，最终必然加剧国际冲突直至导致战争。

在国内，资产阶级国家还会通过财政扩张、信用扩张、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扶持、福利市场化、消费信贷等方式，暂时扩大有效需求，把一部分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吸收到新的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中。这样做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能是把矛盾推迟、转移和扩大。

中修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在国内依靠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土地财政、城镇化和消费刺激等手段，暂时缓解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造成的压力。

扩张海外市场

中国在经过一轮轮资本主义改革后，逐步变成了由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经济命脉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创造了强大的国防和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这些成果被官僚资产阶级掌握，成为他们维护资本主义复辟、推进资本积累的物质基础。

复辟初期的中国，首先是以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政策让利，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国际资本转移产业、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场所。在加入 WTO 前后，中国主要还是低端商品输出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产业链中的加工基地，其对外扩张表现为商品输出和承接国际资本。这一阶段，中国已经并没有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展开全面的帝国主义争霸。

中修所谓“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中修继续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世界资本提供生产基地，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官僚垄断资本的积累，中修开始鼓励一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这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并不停留在单纯的被动依附的位置，而是在依附、积累中逐步向外扩张。

中修供认：

> 1992 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1997 年，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同年，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所以，江泽民同志在 97 年就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概念，缺一不可。

2000 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同年 2 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的战略”，“‘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情况与二十多年前不同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更具备了，要求也更迫切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会为实施这一战略带来更多的机遇。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去施展身手。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2000 年 3 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基本上就把“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了。2001 年，就把它写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是这样阐述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鼓励企业利用国外智力资源，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和设计中心。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实现国际化发展。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2002 年，在党的第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第三个时期，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走出去”战略也非常重视。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2003 年 10 月，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是适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

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之后，胡锦涛主席有一系列的指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改善服务和监管，务求实效”。

“要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取得实效上下功夫。这既是新形势下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2005 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加大信贷、保险外汇等支持力度，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修的“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官僚垄断资本在长期积累中，逐步向外扩张的表现。2001 年中国加入 WTO，标志着中国被更深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低端制造品输出国和国际资本积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同时，这也为中国官僚垄断资本日后扩大其海外经营，进行资源控制、工程承包、资本输出和跨国经营创造了条件。

加入 WTO 后，中国资本主义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端商品输出迅速积累资本。随着规模扩大，官僚垄断资本开始向外寻求市场、资源和投资空间。

面对国内市场的饱和，官僚垄断资本亟需向外转移矛盾。它不仅需要输出商品与资本，更需要国外的市场、资源，以及保护海外利益的军事力量。近年来，中修大力发展远洋海军和军事投送能力，正是这一扩张需求的体现。因此，中国与美欧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从产业链摩擦升级为全面竞争。矛盾的双方均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能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危机。

扩大国内市场

中修为了延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到来，不仅向外扩大市场、输出商品和资本，而且在国内通过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财政、城镇化和消费刺激等方式，暂时扩大有效需求。

90 年代末，中国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紧随其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使外部市场受到冲击，出口吸纳过剩商品的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修不得不把扩大国内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它采取的并不是提高劳动人民实际收入、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办法，而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国家出面扩大投资，以此为资本积累寻找新的出口。

中修文章供认：

> 国家开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集中建设了一大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从 1998—2002 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6600 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吸收了一部分过剩资本和过剩产品，也带动了钢铁、水泥、机械、建筑、交通等相关产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没有改变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根本问题。它只是通过国家投资和信用扩张，把危机暂时压下去，并把新的矛盾积累到财政、金融、地方债务和产业结构中。

在这一过程中，房地产逐步被卷入地方财政和金融扩张的体系中。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结合在一起，使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金融资本和建筑产业链共同依赖的增长领域。这里不能简单说“房地产变成商品”本身就是消化过剩产能的主要办法；更准确地说，房地产是在国家投资、土地财政、城镇化和信用扩张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暂时吸纳资本、拉动产业链和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领域。

因此，房地产泡沫并不是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出路，而是资本主义推迟危机的结果。它一方面暂时带动建筑、钢铁、水泥、家电、金融等行业扩张，另一方面又把沉重的债务压力压到劳动人民身上，并制造出更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矛盾。

2008 年的四万亿计划，是中修用凯恩斯主义手段给经济打强心剂的典型。它通过国家投资、信贷扩张和地方融资平台，暂时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是，这种刺激并没有消灭危机，只是把危机推迟到更大的债务规模、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更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之中。关于四万亿计划，在《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一书中有详细解释，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除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相关投资外，中修还试图把资本扩张的触角伸向广大内地和农村。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和部分内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完全被纳入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为了把这些未被完全开发的“处女地”进一步转化为商品倾销市场，中修搞起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由国家主导的消费刺激政策。

中修表面上打着“补贴惠农”“改善生活”的旗号，实质上是用有限的财政补贴作诱饵，把城市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中积压、过剩的商品推向原本购买力有限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中修既为部分过剩工业品寻找了出路，也进一步打通了资本下乡的通道，把更多地区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群众斗争的烈火在燃烧

丰城农民抗税运动

对于丰城农民的抗税运动，我们暂时还没能找到现成的资料，只能将一些网络上的信息整理出来：

丰城运动主要发生地袁渡镇有 4.3 万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六百多万元，而全镇实际税源仅二百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加上该镇集资

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 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 852 万元，人均二百元。该镇河垄村 1999 年 752 户 3,023 人，税费负担 780,694.9 元，总额比 1998 年增长 14.1%，人均负担 258.25 元，亩均负担 230.36 元，户均负担 1,038.16 元。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

1999 年 8 月，江西丰城某乡一位周姓农民，因为不满当地政府加诸于农民头上的过重负担，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 50 多人到乡政府讨要说法，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

血债需要血偿！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成为了导火索，丰城农民抗税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闻风而动，开始造乡政府的反了！他们自发地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夷平了乡政府。愤怒的农民将往日鱼肉百姓的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并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曾经欺压人民的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偷了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才得以逃到县城。

当夜，江西省调派大批警力进驻丰城，镇压为争取权益而斗争的农民。农民组织的骨干遂藏进山里。31 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

受到农民一次又一次革命造反运动的威慑，中修中央不得不通电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2000 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 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农民用自己的力量，迫使中修取消了农业税，暂时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农民的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的革命传统。党内资产阶级用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径，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地上天国，而它们的地上天国也不会长久了。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自觉地组织起自己的先锋队。而先锋队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终将创造出属于劳动人民的地上天国！

建立新的先锋队的尝试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随着群众斗争愈发激烈，一些革命者主动组成先锋队，自觉地领导革命运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我们已知的第一支先锋队——在中国河南大地上诞生了。然而，由于马毛党的纲领路线没有很好地符合斗争实际，终于被反动政府所镇压了。同一时期，江西丰城爆发了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抗税运动，农民的一场场运动，增长了人民的斗争精神，展示了劳动人民的力量，终于迫使中修政府停止了农业税的征收。然而，由于缺乏一个有力量的先锋队的领导，参与运动的人民往往在事后遭到倒算，而不能组织起有序的撤退。

自从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未止息。1976 年后，一个又一个革命政党如流星一般划过中国的黑夜。分析这些政党的经验，对我们今日的革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各个革命政党的经验与教训：

贵州清镇、织金“中国共产党马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党”（1976.10-12）

康岩中（原省公安厅科长、省革委副主任）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造反派代表积极活动，一度被走资派革职下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带领革命派向走资派重新造反，1976 年 11 月获悉省委将对其代表的革命派采取措施后，销毁证据、携枪化名逃亡。12 月 2 日至清镇与赵普明（“社会主义革命党”首领）、陈茂英商议，共同策划扩建基地、攻占遵义/贵阳等。反动公安获情报后，于 12 月 11 日在织金县龙场区直接实施拘捕行动。康岩中持枪反击，被敌击伤，几位革命者被逮捕。

湖北宜昌“中国马列毛共产主义党”及关联组织（1976.10-1977.2）

记载于秭归县志（宜昌下辖）卷二十“司法（一）公安”篇。1977 年初反动公安机关大规模抓捕革命者，被中修当局定为“重大反革命集团案”。韩庆侯等核心革命同志印发马列毛著作、筹建无产阶级政权雏形，革命活动被本

地叛徒或反动分子举报并暴露后，迅速被反动势力摧毁。革命组织规模较大但隐蔽性差。

四川丰都、石柱“中国(马列)共产党”(1976.12)

属西南基层自发反动响应，迅即被反动势力镇压。革命组织规模小、活动限于批判资本主义复辟与筹建，极可能因集会或传单被当地反动治保/公安发现，短期内被摧毁。无具体抵抗记载。

云南广南那洒“中国马列党”(?-1977.4)

管兴林等革命同志以学习毛著、反修宣传为主，针对地方走资派。1977年春被反动势力破获，属云南同期反动清查运动的一部分。很可能通过农村基层叛徒举报或宣传材料暴露。

河南洛阳涧西"中国马列共产党"(1978.12-1980.4)

崔新福等革命同志以工厂工人、老造反派为主，在工业区开展革命活动。被反动势力依赖厂区保卫系统监控与叛徒举报(明确针对“两个凡是”及资本主义复辟措施)破获，革命活动持续约1年半后被中修收网。

云南威信“中国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1978-1981)

熊永章、熊永华、韩正远等革命同志筹建“全国性中央委员会”、印发革命纲领、面向农村开展活动。1981年前后被反动势力抓捕。地方反动公安通过农村监控网络发现革命筹建活动。

江苏徐州“毛泽东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关联(1981.3-1983)

1983年7月起组织7位革命同志组成“中国人民党”，策划夺取武器、摧毁反动要害、劫车上山开展游击战。在1983中修“严打”第一战役中被反动公安机关“一网打尽”(情报汇总后集中突击抓捕)。

甘肃武威、张掖、金昌“中国劳动党”、“人民军”(1982)

任某、杨某、解某等同志在农村/农场筹建“劳动党”及武装“人民军”。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活动痕迹被发现，1982年被中修破获。

安徽霍山“中国劳动党”(1982)

面向贫苦农民/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并建党。被中修同期镇压。基层叛徒举报或会议暴露后快速被摧毁。

河南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

这是 1985-2000 年间规模最大、最完整、最具全国影响的马列毛主义党，直接回击了中修国企的私有化改制，是下岗潮中工农群众觉醒的典范。革命成员主要为登封及周边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峰值近 2800 人（中修公安确认 1031 人：899 农民、百余工人/教师/干部/退休人员；90%初中以上文化，2/3 为 25-45 岁）。明确宣布现中共已蜕变为“堕落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工具，批判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印发毛主席著作与《彻底摧毁邓氏集团》革命纲领；设立宣传、劳工、军事、妇女等部门及县区委书记；组建“农民自卫军”（武装自卫性质）；结合下岗潮欠薪、失业抗争，号召“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恢复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公社。

1995 年起反动公安机关正式立案“重点侦察”，设立专案组（专案名称即含“彻底摧毁邓氏集团”），因基层叛徒报告发现王五州（自称“河南省委特派员”）等革命同志在登封及周边工厂/农村组织学习小组、印发毛主席著作与革命纲领、设立部门、筹建“农民自卫军”（武装自卫性质）。线索来源主要为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革命活动痕迹（集会、材料传播）被单位保卫或治保反动分子举报。经数年秘密监控、跟踪、材料搜集，1998-1999 年中修当局大规模统一抓捕行动，王五州等核心革命骨干被捕（王判 15 年，臧永钦/董得安原判 10 年，后减刑释放）。全体革命成员被列“重点人口”监控、强迫悔过。张文正（跨登封-许昌组织者）等国企下岗工人革命活动与登封核心联动，1995 年后纳入同一专案侦察。同样由于厂区保卫系统发现宣传“继续革命”、反对卖厂等材料，结合登封线索交叉锁定。1998-1999 同期被中修抓捕收网。

河北永金“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1999.5.16-2000）

用户“永金”指河北正定县“永进化工厂”（或简称永金/永进）。王世吉同志（化名“毛继东”，一人自任书记）1999 年 5 月 16 日在工厂宣布成立

革命组织，设计党旗党徽，5 月 18 日起寄送数十封批判信（邓、江为修正主义，呼吁恢复毛泽东的路线）给中修中央。信件被邮检截获或工厂保卫发现其革命活动痕迹，石家庄市反动公安于 1999 年 8 月 12 日直接抓捕。2000 年 11 月王世吉同志被中修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 3 年，2002 年 8 月释放。

以上所述的这些政党，无不因其自身的弱点，而终于被资产阶级政府所剿杀。在今天，中国的先进分子应当吸取这些政党的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上的经验，进行新的斗争。

在阶级构成上，这些政党的成员主要为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老造反派、基层教师/退休干部。以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为例，反动公安确认 1031 人中有 899 位农民、百余位工人，约 90%的成员拥有初中以上文化，其中 2/3 为 25-45 岁青壮年。他们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直接受害者，对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中官僚资产阶级的仇恨最深，自发要求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同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社会经验较丰富，比今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谈“建党”更先进。

在下岗潮和农村“第二轮圈地”过程中，亿万工人农民开展了罢工，游行，维权和请愿等自发斗争，但这些政党大多停留在成立学习小组、印发纲领和设立空头部门等初步阶段，并未将这些自发斗争提升到自觉、有组织的革命高度。结果，先锋分子脱离了群众，许多群众虽抱有同情，却未能被充分动员起来保护这些组织。

复辟初期，阶级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走资派牢牢掌控了国家机器、户籍制度、单位管理和治安网络，而新生资产阶级则利用“改革红利”暂时麻痹了部分中间阶层。这些政党代表的是被打倒的无产阶级中觉醒的部分，而并没有广泛发动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的广大群众。

今天的我们，必须深入融入工人和农民群众，从日常的经济斗争入手，例如讨要欠薪和反对征地，逐步建立起工农联盟的战斗组织。脱离阶级的实际，单纯宣布建党，只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躁病。

在路线上，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时期（1976-1999 年），这些政党未能充分认识到复辟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她们试图在短期内“重建中央”、筹备人民军队，更有甚者，将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寄信呼吁中央辞职。例如，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从 1991 年的学习小组起步，到 1995 年被专案侦察，仍坚持公开印发《彻底摧毁邓氏集团》等材料，缺乏地下的隐蔽埋伏的策略。

这些政党生搬硬套文革时期的夺权和学习小组形式，未根据如城市下岗潮和农村分田单干等新条件创造出新的斗争方式。有些小型政党，如河北王世吉一人成立的革命共产党，更像是萨布林式的个人英雄主义。

此外，它们未能在新的历史阶段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根本问题。她们虽然正确地将修正主义集团视为敌人，但对中国阶级和阶级变化判断不足，没有将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复辟后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为自己制订正确的策略，导致自身陷入孤立。

在组织方法上，这些政党的保密与地下工作的方法极为薄弱，她们多采用手抄或油印材料、邮寄批判信件，以及通过集会发展成员等方式，全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根据公安志的记载，通过邮检截获、单位保卫部门举报、治安网格监控，以及抓捕一人即可挖出全案等手段，导致组织轻易暴露。这些反映了以上的政党缺乏如单线联系隔离措施、假身份，以及以工会或学习小组为外衣的合法掩护。

另外，这些组织中最大的尽管发展了两千余人，但群众工作与组织纪律严重脱节，既缺乏严密的纪律训练，也没有建立“支部建在连上”式的战斗堡垒。领导骨干集中暴露，核心成员一抓即全网崩塌。

组织建设必须服从于革命路线，并具备铁一般的纪律和灵活的地下工作方法。这些政党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即使拥有良好的阶级基础和政治路线，也无法保存力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批判

四万亿计划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面对经济危机的“强心剂”。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阻止危机的再一次到来，一旦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到一定阶段，这针强心剂自然就失去了作用，反而使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

四万亿计划实行不久，这一趋势便更加明显地显露了出来。而在 2015 年，走向爆发经济危机的趋势愈发明显。面对危机，资产阶级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图通过破坏生产力，让人民为危机买单：试图通过发展科技产业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并通过削减过剩产能等一系列方法，将危机转化为了人民的痛苦。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进行兼并重组民营企业，转嫁债务到人民头上，自身实力得到了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修官方的声明中，可以归结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的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强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我们在具体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上，官方是这样说明的：

“供给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浪潮进行回应。从宏观层面看，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创造需求，同时消费也会对生产、需求对供给产生反作用。只有二者保持相对均衡，才能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调控使之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从微观层面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必须进行创新，成为创新活动的先行者，以生产更加物美价廉的新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打破原有技术条件下市场供需相对均衡的态势并获得高额回报。与此同时，市场上的其他主体也会效仿创新活动的先行者，通过淘汰

落后产能、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式，分享创新活动产生的超额利润。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超额利润逐步转化为平均利润，如此不断反复，社会经济技术水平就会不断上升到新的层面，新的市场需求就会被不断创造出来并得到满足，经济发展质量也会不断提高。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供给侧都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总要与需求侧相配合才能发挥出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说：

宏观上看，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调控，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均衡，也就是说，避免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

微观上看，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必须进行创新活动，才能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才不至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但是，一个企业使用了新技术，却不能长久地独占这一技术。其他企业也会学习这一技术并同该企业竞争，一旦社会普遍使用这一技术时，这个企业的超额利润就会丧失，而其曾经的超额利润率就会成为社会的普遍利润率。

中修反动文人是看不到人民的疾苦的，这并非是他们眼睛瞎，而是因为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歌功颂德。至于人民的苦难——那些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改革的“阵痛”；对他们来讲，这些人，“怎么能算人呐！”

这些反动文人，正是站在这样反动的立场上，来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他们来说，这场改革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无论是生产资料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改进，还是对中国金融杠杆（指经济主体（企业、个人或政府）通过借入资金（增加负债）来放大现有自有资金投资规模，从而试图成倍放大投资收益（同时也会成倍放大风险）的金融机制。就像物理学中的杠杆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撬动重物一样，金融杠杆的作用是“以小博大”。）的削减。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说明这一过程真正的实现过程，因为这一过程的实现，只是通过无情抛弃人民的利益来实现的。

下面，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样的改革。

去产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题为《中国式产能过剩：历史考察及对新发展阶段治理的启示》一文中，这样说明中国 2015 年左右的产能过剩情况：

（一）产能过剩的背景

从国内来看，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于 2008 年中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各地掀起新一轮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热潮，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2010—2011 年，CPI 增速连续超过 3%，PPI 增速超过 5%（表 2），“防通胀”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2010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2009—2010 年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基调进行调整，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标志着宏观调控政策整体收紧。从国际环境来看，2010 年左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2011—2015 年全球 GDP 增速 3%左右，较 2004—2007 年 4%以上的增速回落明显。受此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回落明显，2012—2014 年出口增速持续低于 8%，较 2003—2007 年 25%～35%的增速大幅下降（表 2）。

（二）产能过剩的表现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收紧以及出口增速回落，叠加经济刺激计划所形成的新增产能集中释放，过剩问题全面凸显，产能过剩从部分行业转变为全局性过剩。数据显示，2013 年 24 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 19 个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其中，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2012 年末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 72%、73.7%、71.9%、73.1%和 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另外，许多新兴产业与高端产品，如光伏设备、风电设备、LED 等，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剩。

产能过剩对工业企业效益与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可以概况为“一降四升”。一是 GDP 增速回落较快，经济增长压力明显加大。2012—2015 年中国 GDP 增速区间为 7%～8%，较 2008—2011 年的 9%～11%明显下滑，而且呈现逐年回落趋势。二是工业产品价格下降明显，经济持续处于“通

缩”状态。2012—2015 年 PPI 持续下跌，并且跌幅有扩大趋势，其中 2015 年 PPI 跌幅 5.2%，为历史第二大跌幅（表 2）。三是企业经营效益明显下滑，亏损面持续扩大。2012—2015 年，重点工业行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下降，利润总额增速下滑（表 4）。例如，煤炭业连续四年利润总额增速为负，企业亏损面从 13.0%上升到 3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三年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为负，企业亏损面从 20.0%上升到 23.4%（表 5）。四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政府财政压力显著加大。2012—2015 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区间为 8.4%～12.8%，显著低于 2008—2011 年的 11.7%～24.8%。五是宏观债务水平快速上升，经济系统风险加大。大量“僵尸企业”的出现导致银行坏账、死账规模快速扩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2015 年末中国全社会杠杆率（未包含金融部门）为 254.8%，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以上的文字，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说：2008 年的四万亿计划在各地出台后，各地的经济受到刺激，盲目扩大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同时，国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商品难以出口，致使生产过剩的产品愈发难以找到销路，生产过剩愈发猛烈。与此同时，随着生产过剩的加剧，经济出现了倒退，工业产品整体价格下跌，企业利润与财政收入下跌。然而，在金融上的风险却在不断上升。

面对这一情况，中修只能使用毁灭生产力的办法，制定“去产能”政策，通过消灭生产力的办法，来恢复供求平衡。

中修资料这样供认：

> 2013 年至 2015 年，中国淘汰落后炼钢炼铁产能 9000 多万吨、水泥 2.3 亿吨、平板玻璃 7600 多万重量箱、电解铝 100 多万吨。2016 年，中国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亦成效初显。与此同时，新动能快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 4.5 个百分点；全国新登记企业 553 万户，比上年增长 24.5%。

——2016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近几年的“去产能”的表述

2016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和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累计退出粗钢产能超过1.2亿吨、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分流安置职工110余万人，2017年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6500万千瓦，提前超额完成了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取得积极进展，市场竞争秩序得到有效规范，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完善。

——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8〕554号）

这种所谓的“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和“利润回升”，绝不是社会生产力真实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建立在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与资本重组的基础上的。

大资本吞并小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极度强化，正是这一剥夺的鲜明写照。危机总是加速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形成。“去产能”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资本内部的兼并战。被强制关停、淘汰的“落后产能”，绝大多数是没有国家信贷背书的中小民营资本。随着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破产出局，煤炭、钢铁、建材等上游基础产业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大型国有垄断资本集中。供给端被强行收缩之后，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大幅飙升，大型垄断国企借此攫取了惊人的超额垄断利润。

与此同时，对千万产业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去产能”不仅消灭了“过剩的”机器，更摧毁了无数工人的生计。中修资料中，“去产能”所造成的“分流安置职工110余万人”，实际上是继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制”后，对工人阶级的又一次的大规模剥夺。大量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失去了相对稳定的工作，被抛入残酷的劳动力市场，沦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批劳动力被迫流入服务业、外卖平台、物流快递等所谓的“新动能”领域，忍受着缺乏劳动保障、随时可能被解雇的“灵活就业”状态。这使

得资本通过算法和极度延长的劳动时间（996、白加黑），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无产阶级的绝对剩余价值进行疯狂榨取。

此外，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依然低迷的背景下，从“去产能”中被挤出或积累的庞大过剩资本并没有消失，它们疯狂地涌向了收益率更高的金融系统和房地产领域。伴随着 2015 年开启的“棚改货币化”，国家将巨量债务转移到了广大城乡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上。实体产业的过剩危机，被转化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劳动群众不仅要在生产领域遭受剥削，更要在流通和消费领域（高额房贷）被金融资本吸二次血。

去库存

所谓的“去库存”，是中修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将自己的债务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从而对人民欠下的另一笔血债。

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泡沫在 2015 年左右，已经接近了破裂的边缘，2015 年，中国的三四线城市面临巨大的房地产库存积压，房地产的资金链条处于断裂边缘。房地产危机即将来临，为了化解这一危机，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发行了 PSL（抵押补充贷款），下面，我们来看看中修央行的 PSL 是怎样将房地产的包袱渐逐去除，而人民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怎样的灾难。

PSL，即央行于 2014 年创设的一种结构性货币工具，官方供认，这一货币工具主要服务于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其发放对象是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这一结构性货币工具的作用机理是：央行为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及农发行三家银行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这三家政策性银行再把这些资金贷款给各项目，这些项目是特定的，其中包括棚户区改造。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等等。这些项目拿到贷款后，就会进行棚户区改造等工程，但是，棚户区改造工程并不是建设新安置房，而是拆迁旧房的同时，将拿到的贷款，作为拆迁补偿款发放给折迁户，让他们拿补偿款

购买新房，这即是 PSL 的传导方式，而拆迁户收得补偿款作为补偿的方法，即棚改货币化。

棚改货币化，是通过政府定向向棚改等领域发放资金，促进房地产市场库存被消化，进而稳定经济的一种手段，现在我们未分析一下，棚改货币化后，中修政府和居民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动。

首先，对居民来说，棚改货币化，使其需要花补偿款购房，然而，正如中修所供认的那样：

> “此外，有些地区在棚改和去库存过程中，也出现了为实现速度、目标，扩大棚改规模并间接拉动了房价上涨的情况。比如，拆掉并没有达到使用期限、条件并不危旧且居住位置较好的房屋，使一些居民不得不用安置款加贷款去购置位置较远的库存商品房。”——《兼顾棚改和调控双重目标》中国政府网

这即是说，许多居民的补偿款并不足以支持他们购买新房。对于这些居民而言，他们不得不贷款去买房。这样一来，居民欠下了房贷，而开发商卖出了房子。开发商的坏账，便以房贷的形式，转移到了居民头上。

不仅如此，棚改货币化还造成了另一种恶果：即货币化安置使许多居民拿到安置款后，去购买新房。这样一来，购房需求迅速上升，房价也随之上涨。结果，不仅棚改户的负担加重了，整个社会所有买房居民的负担也都加重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房子卖出去了，钱赚到了，坏账消除了。在这一链条中，房产的坏账转移了，市场的秩序“恢复”了，房贷的负担更重了，人民的苦难更深了。

中修官方不得不供认：

> 实践表明，持续推进包括货币化安置在内的棚户区改造，确实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促进了城镇化建设和城中村改造，提升了城市功能和承载能力，并推动了三四线城市楼市去库存，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和经济增长。不过，由

于货币化安置及相关的一些购房补贴、奖励政策使需求明显增加，使得一些地区的房地产库存显著下降，价格也一路攀升，甚至对冲了以控房价为目标的一些楼市调控措施，导致一些三四线城市在调控背景下房价不降反升，甚至快速上涨，这必然导致包括货币化安置居民在内的所有居民购房成本上升，压力加大。——《兼顾棚改和调控双重目标》中国政府网

去杠杆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一个企业通过借贷来发展，用较少的资本撬动较多的资本，这种机制就叫“杠杆”。杠杆率，简单来说，就是衡量资本“以小博大”疯狂程度的具体指标。如果资本家自己只有 100 元的本金，但他通过向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借来了 900 元，凑齐了 1000 元的总资本去投资扩张。那么，他的资产负债率就是 900/1000=90%，而他的财务杠杆率就是 1000/100=10 倍。这意味着，一旦投资赚了 10%（即 100 元），对于资本家来说，他用自己的 100 元本金就赚回了 100 元，实现了 100%的超额暴利。这种机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市场行情不好，投资亏损超过 10%，他的本金就会瞬间清零，并且立刻陷入资不抵债的破产泥潭。而在社会层面，杠杆率通常是指全社会的总债务量（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借的钱）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下，资产阶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会盲目且贪婪地不断推高杠杆率，疯狂借贷扩张。但这种建立在庞大债务堆上的“繁荣”是极其脆弱的。一旦生产过剩导致产品卖不出去，企业赚不到钱、还不上利息，高杠杆率就会瞬间化为引爆经济危机的炸弹。

去杠杆，本质上是一种推迟危机爆发的手段。去杠杆政策，大致有以下几种实施方法：

第一，砍表外信用，收影子银行。

表外信用，即商业银行从事的，按通行会计准则不列入常规资产负债表内的信用中介业务。通俗来讲，就是银行为了规避国家对贷款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严格监管，将一些放贷业务转移到账本之外进行暗箱操作。

影子银行，即游离于传统银行业监管体系之外，却从事着类似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具有信用创造功能的实体或业务活动（如部分信托公司、理财产品、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等）。

砍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是因为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的过度扩张，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安全。表外信用和影子银行的无序扩张，使得中国金融的杠杆攀升，推高了金融风险。对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的整治，一方面可以降低中国的金融杠杆，缓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挤压了许多民营资本的借贷空间。许多民营资本依靠表外信用和影子银行生存，而这一政策使这些企业破产倒闭。而且，大型的国企由于能更容易地取得正规贷款，因而更容易在危机时存活，进而兼并难以获得贷款的小型企业，并进一步加强其垄断地位。

第二，用行政、金融、法律等工具，对企业资产负债表进行重排。

2016 年国务院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一文中，说明了降杠杆的方式：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增资扩股，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这些措施的要害，在于国家出手对企业重新编队，实际上由国家决定哪些企业能活，哪些企业该死。由于小型的、负债依赖影子银行的企业率先被出清，而大型的垄断企业并不受这一政策的影响，垄断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兼并等方式，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降成本

“降成本”，在官方的政策文章中，可以归纳为“简政放权”与“减税降费”。其目的是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刺激经济发展。

然而，降成本并不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官方明确指出，不仅要“降低税费”，还要改革低效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降成本’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和转型结合起来。如果只是为降而降，甚至是为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抬轿子，那就不符合以‘降成本’盘活企业，进而带动经济转型的初衷了。”

所以，降成本降的只是“先进企业”的成本，落后企业并不在目标范围内。这加速了先进大企业对小型企业的兼并，提高了大企业的垄断程度。与此同时，“降成本”也使无产阶级的苦难进一步加深了。

在“降成本”的具体措施中，除了政府减税、降低融资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降低用工成本。

那么，用工成本如何降呢？用工成本说白了就是购买劳动力所耗费的钱，即发给工人的总工资。为了降低用工总成本，大致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所谓的“减员增效”，即通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用机器替代人，在一定的时期内，降低雇佣员工的数量，或者是解雇一批暂时多余的员工，这就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而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又造成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被动局面，使得普通工人的工资能够被进一步降低。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降低用工成本本质上是对工人的进一步剥削，是工资进一步降低的代名词。

劳动力的贬值与工资的降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简单劳动（如体力劳动者）而言：“去产能”造成的失业潮，使劳动力供给过剩，工资更加低廉。资本家如是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至于那些被抛向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为了养家糊口，只得选择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的“即用即弃”型“灵活就业”平台，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劳务派遣工等。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不给他们社会保障以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

面又通过平台算法榨取他们的每一分钟，并利用广大的失业群体威胁他们“老实工作”。

对于脑力劳动者而言：　　“降成本”意味着“996”已成为常态，甚至出现了更多的

“007”（即从凌晨 0 点工作到次日凌晨 0 点（24 小时待命），且每周 7 天不休息），即延长工作时间而工资不变。

所谓的“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其全部涵义就在于此。

补短板

“补短板”，在中修官方的论述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能力短板，即所谓的“卡脖子”技术。

第二，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即 5G 基站、基层公共服务等与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需求，也就是中修所谓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第三，制度与营商环境，即“软短板”，着力点在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微观市场活力。

而“补短板”政策，本质上是通过科技发展，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经济，从而消耗过剩产能，达到缓解、延迟经济危机的目的。然而，这种依赖创新刺激经济的办法，是一种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强心剂。它虽然能暂时制造经济上的景气，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它会导致经济危机在未来更猛烈地爆发。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政策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来人为地扩大总需求（比如大搞基建、发放补贴等），以此来强行消化过剩的产能。然而，这种依靠国家干预的“强心剂”虽然能解一时之渴，却无

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它只是把当前的生产过剩危机，转化为了未来的通货膨胀和债务泡沫。

而中修官方所谓的“补短板”，特别是“补短板”中通过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科技创新和新基建来刺激经济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刺激政策。

这种政策的后果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失业的加剧。

国家投入巨资去研发“卡脖子”技术和建设新基础设施，确实在短期内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创造了新的利润，让那些垄断资产阶级和大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科技的飞速进步，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进一步提高（即购买机器设备等不变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而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比例越来越小）。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算法将以更快的速度替代活劳动，大量工人将被排斥出生产过程，沦为产业后备军，这将进一步压低整个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

第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

国家主导的科技攻关和新基建，在短期内可以给一部分垄断资本带来订单、补贴、融资和市场优势，使它们获得暂时的超额利润。但是，从整个社会资本来看，这种技术升级必然推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机器等不变资本不断膨胀，而雇佣活劳动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相对下降。

由于机器本身不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从活劳动中产生，资本家为了竞争，不得不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但当这种技术从个别企业推广到整个行业以后，个别资本的超额利润就会消失，整个社会资本反而面对更高的固定资本投入、更重的折旧压力和更低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家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降低原材料成本、扩大对外市场等办法来抵消这种趋势，但这些办法只能暂时延缓矛盾，不能取消矛盾本身。

因此，“补短板”不是消除了危机，而是在更高技术水平上扩大了资本积累的矛盾。资本越是依靠机器和技术来追逐利润，利润率就越是下降。利润率越下降，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就越深。

第二，更高水平上的生产过剩。

利润率趋向下降，并不会使资本自动停止扩张。相反，为了弥补利润率下降，资本往往更加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用更大的产量、更快的周转、更广的市场来维持利润量。这样一来，生产过剩就被推向了更高水平。

新技术的应用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社会生产力空前膨胀，商品的生产效率和规模将成倍增加。但是，正如我们在“降成本”中所分析的，广大无产阶级的工资正在被不断压低，购买力严重不足。一边是科技升级带来的天量产品，另一边是因剥削加深而日益萎缩的消费能力。

因此，这种依赖科技创新刺激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供需矛盾，而且在将危机向后推延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更具破坏力的能量。资产阶级企图用发展新科技、拓展新产业的办法，来逃避经济危机，结果，只会是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制造出了一场规模更加空前的生产过剩危机。旧的“短板”在技术上被补齐了，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与消费不足的“短板”，却被拉得更长了。这就是“补短板”政策的最终的必然的结果。

因此，这种依赖科技创新和新基建刺激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根源，反而在更高的程度上加深了危机。一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创新排挤活劳动，制造更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活劳动相对缩小又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工资、扩大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科技的短板被补齐了，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短板——利润率下降、贫富分化、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变得更长了。所谓“补短板”，最终不过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准备一场更猛烈的危机。

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批判

今日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与之相伴的，是理论上的全面倒退。今日中国官方学界的理论，已经从社会主义倒退回了彻彻底底的修正主义。这些理论除了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以外，就与马克思主义再无任何缘分了。我们在这里概括性地讲讲，中国官方学界是怎样一步步篡改马克思主义的。

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相适应，中国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也开始了复辟进程，与之相伴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遭到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披着科学社会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理论。这套理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套理论，对内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为资本主义复辟张目，避而不见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进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的基本理论，将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打成“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麻痹人民，消磨无产阶级群众的斗志，使白色江山永代相传；对外则妄图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否定曾经的红色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必要性，污蔑各国的革命政党和革命人民。他们幻想这样就能扑灭世界革命的烈火，明火执仗地对外进行侵略扩张。

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一方面在理论上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拿修正主义的旧货色麻痹人民；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中对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屠戮，这帮豺狼在本国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在国外支持各国反动政府，对革命人民进行围追堵截。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下大力气麻痹人民，镇压人民，就可以消除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反动派的反抗斗争。可是他们不懂得，世界是物质的，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物质的运动，而物质的运动是有其自身发展运动的规律的，人的实践活动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部分，终归是体现

并符合人类社会这一物质运动的发展规律的，任何妄图用自身力量阻止物质运动的发展，无视物质运动发展规律的反动分子，终于会像坠楼的人受重力定律的支配一样，被社会运动这一物质运动规律打个粉碎。现实情况是，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怒潮汹涌澎湃，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印度、菲律宾、伊朗、哈萨克斯坦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全世界马列毛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相继建立，这就从实际行动上打击了中国修正主义集团的狼子野心。

与之对应的，在哲学方面，马列主义哲学被修正主义集团彻底抛弃了。修正主义集团惧怕马列主义哲学所体现的，关于社会物质运动的真理。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打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而用一套将实践提升到首位的哲学，取而代之。这反映了他们妄图用自身的实践反对社会物质发展的规律，极端惧怕社会物质发展规律，惧怕接受他们终将被革命人民所打倒的历史命运的，外强中干的丑态。

现在，我们将从理论上，彻底反击中国修正主义集团的修正主义思潮。下面，我们会揭露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动学术垃圾，并从理论上消灭它们。

关于修正主义官方哲学

（一）

匈牙利资产阶级哲学家、修正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近来深受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吹捧。张一兵，张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修反动文人，无不替他作辩护，并继承，发挥他的实践哲学思想。这是由他们复辟倒退的反动本质决定的。这群反动文人并不是在发展哲学理论，而是替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倒行逆施作辩护。这决定了这群反动文人只能捡起历史的垃圾替主子辩护。而一旦他们遇到了革命的进步的哲学，他们却只能或使用造谣诽谤的手法，污蔑进步的理论，或陷入了唯心史观，以此来讨他们主子的欢心。

（二）

今日的资产阶级哲学，呈现出两种表面上截然不同，但本质却相同的样式。

一种是表面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这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与新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

另一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名号的资产阶级哲学。这种哲学最初来自混入西欧的一些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后来这些理论家大都成为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授。在西欧等国的共产党尾随赫鲁晓夫走上三和两全等修正主义道路后，西欧各国的进步青年开始反对这些修正主义政党，他们组成新左派的

组织，来同这些修正主义政党作斗争。为了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举起了毛泽东等革命派所举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错误理论，从修正主义错误坑中爬起来，又跳进了其他错误的坑中，例如托洛茨基主义，打着马克思名号的资产阶级哲学等等。而这些五花八门的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名号的资产阶级哲学，正是在西欧的新左派运动中被广泛传播的。所以，他们在现在，被人们叫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简称“西马”。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派别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他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个观点过分夸大，以至于偏离了科学的轨道，陷入了唯心主义等荒谬的思想。为了使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要太露骨，为了给自己穿上一件“唯物主义”的红衣服，西马哲学家们便采用马赫主义的伎俩，在“实践”的幌子下偷运唯心主义。

马赫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经验元素”或“感觉复合”。他们强调科学理论只是经验的总结和符号系统，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独立于意识之外存在的观点，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或中立一元论哲学。这种修正主义遭到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批判。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行动的哲学”，是没有哲学唯物主义仍然可以存在的哲学，是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客体”不可分割的“一元论”哲学。有的就把它称之为“实践的一元论”，说什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实践的一元论“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或者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物的同一性”，换句话说，就是“具体意义上的人的活动”使人与“人所变革的自然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列斐伏尔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中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实践形成了“没有无主体的客体，没有无客体的主体”的局面。弗洛姆？在他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更露骨地把马克思的哲学说成是主张“主体和客体是不能分离的“原则同格论”。

如果我们对这一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形式加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马赫主义的新变种罢了：马赫主义是用要素

（“经验元素”或“感觉复合”）来揉合物质与精神，取消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原理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用实践来揉合物质与精神，取消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原理的。马赫主义已经被列宁等布尔什维克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资产阶级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又把它从垃圾堆中拾起来，换了个名字，奉为最新的珍宝了。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的哲学曲解成这种“主体——客体”不可分割的“实践的哲学”和“行动的哲学”以后，就把它作为一种根据，进一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他们大肆宣扬马克思主张自然、客体是人们的活动、实践所“滤过的”、“加工的”，是人们活动的“化身”、产物等等，用以否认自然、物质的第一性和客观性，认为它只是：依赖于人的实践而存在的，只是第二性的东西。有的说，自然“只存在于人的经验与实之中”（列斐伏尔）；有的说，人在实践中，通过自己的力量，“才使外在世界对人来说成为实在的东西。”（弗罗姆）

他们进而否定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对立，否认哲学的基本问题，抹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有的认为，从“实践的哲学”看来，要强调存在和思维、人和自然的对立，就会堕落成为一种“宗教的形式或无意义的抽象”；有的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没有本体论的意义”，因此，无须乎问什么是第一性的，什么是第二性的，如果提出“精神或物质”哪一个占优先地位，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甚至还认为，只有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加以综合”才能有“真正的科学思维”，因为，“没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就不能存在”（阿多诺）;还有人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范围内运用，至于“物质存在”的概念更只适用于“人类以前的和超人类的自然界”（施密特）。

这样，他们得出如下两个结论：（一）是实践而不是物质才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不是统一于物质而是统一于实践。有的公然声称，同精神一样，“物质决不是世界的绝对、本原的统一说明原理”，并反过来指责恩格斯没有用“第一性的、历史的实践，把自然和历史结合起来”，指责恩格斯关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的论述是“不从实践上，而是从形而上学上去把握世界的物质统一”（施密特）；（二）不是“抽象的”物质，而是具体的实践，“才是唯物主义理论

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施密特）。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们既然已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实践的哲学”，取消了物质对精神的第一性，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无论对物质还是精神来说是第一性的东西，是世界的本原，那末，实践自然就成为这种哲学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了。

令人惊异的是：尽管他们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进而把马克思的哲学篡改得面目全非，可是，他们仍然把这一切都统统加在马克思的头上，并以此为根据攻击恩格斯、列宁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他们指责恩格斯是“倒退到独断的形而上学”（施密特），“把马克主义僵化了”、“忘记的辩证法”、“堕入了简单的客观主义”（萨特尔）。他们攻击列宁是“回到黑格尔以前的精神和物质、理论和实践的二元论”，“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水平上去了”（柯尔施）。在他们看来，恩格斯、列宁背弃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真正背弃了马克思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是他们在实践的幌子下，取消了唯物主义，从而也从根本上取消了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把马克思的学说歪曲成一种主体——客体原则同格的唯心主义哲学了。

（三）

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后，中修哲学界便为复辟行动处心积虑地制造复辟理论。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中修哲学界接受了一项任务，中国的一位领导在海外考察时，遇到了一种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为了了解这一思潮，中修哲学界开始对这一思潮进行研究。一开始，中国的理论家们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分析。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这类论调实际上属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范畴。不久以后、这种自发的、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的批判，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制。这些理论家们或主动或

被动的从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到了一味的包容，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错误观点的方向上去了。

中修哲学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辩护的反动本质，决定了中修哲学不可能正视马列主义的真理。而现实也证明，今日的中修哲学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疯狂歪曲与颠倒。

中国实践派从它的老祖宗“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借来了“主客体同一、历史相对性、人的主体选择性和历史偶然性”的打扮，把所谓“现代哲学”对于本质、规律和客观实在的拒斥，当做“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来供奉——其实，这几条哲学路线正是历来的修正主义的一贯伪装，一点也不新鲜。关于这点，我们只需顾下构成伯恩施坦主义的哲学基石的那些观点，回顾下西马如何在主体性口号下背离工人阶级的解放，回顾下高唱“多元独特性”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惨淡收场，回顾下南斯拉夫和苏联——这两个曾高调自称关注“人”“主体价值”、奉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一切就十分清楚了。

这段话摘引自《对非实践的实践哲学的批判》。这本我们素不相识的前辈的小册子有许多错误与不足，我们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写出了今天的作品——这正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体现。

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从属于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列宁指出：哲学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哲学不能脱离阶级斗争，它产生于阶级斗争，又服务于阶级斗争。历来剥削阶级的思想家都极力否认哲学和阶级斗争有密切的关系，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超越”一切阶级之上的、“公正”的、“无片面性”的所谓最新哲学。实际上这些人是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唯心论反对唯物论，并用纯哲学的外衣掩盖哲学的阶级内容。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

中修哲学家们，恰恰否定哲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他们虽然口头上承认“唯心主义往往被剥削集团和统治阶级所利用”，但是他们却割裂唯物主义和历史上的进步力量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使用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犯下的唯心主义错误，来否定唯物主义和进步力量之间的关系。下面的段落，节选自中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

然而，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与政治上的保守与进步是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的。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就其原本含义而言，只是解决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两种对立的进路而已。在第一章中我们曾指出，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矛盾，的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的一种最抽象的表达，而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的解决，无非就是以某种方式将两个对立方面统一起来，或者宣称统一的不可能。但说到统一，除了在哲学史上只占相当少数的宣称统一为不可能的二元论或怀疑论之外，就其可能性而言，任何一种统一的理论都只能是或者基于思维一方，或者基于存在一方，而不可能超越于两方面之上于是，这便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对哲学基本问题解决方式中的两大对立派别。各种以思维或精神为基础去实现统一的理论，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而各种以存在为基础去实现统一的理论，这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便是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原本含义。就哲学自身而言，它作为对于人类存在之本原性矛盾的终极解决的探求，其意义只在于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去穷究那超越了人类有限经验的东西，因而这种解决方式的对立本身并不包含有关于现实政治的意义。恩格斯说得好，除“什么是本原的”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如若不然，“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便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但说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同政治上进步与保守的对立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并不是说哲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哲学作为一种人类活动领域，总是要由具体的哲学家来进行的；哲学本身可以是抽象的、超越于现实政治生活的，但哲学家本人却不可能生活在一种超越于现实的领域中，他必然同时生活于哲学之外的其他人类生活领域，尤其是无法不生活在现实的政治、经济领域，这样，他就有可能使他的哲学活动在某种程

度上服务于他的政治活动或政治利益。这样使哲学活动直接地服务于政治的结果，便是使哲学活动意识形态化了。这是从哲学方面看的。此外，政治活动本身也具有使哲学活动服务于自身，使之意识形态化的强烈冲动。所谓政治活动，总是涉及处理一群人之间的关系，涉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为要在对于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便须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和吸引更多的社会赞同，而意识形态化了的哲学理论无疑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有效工具。然而，既然哲学活动本身是超越于现实生活的，那么，这种与政治的结合便不是由哲学理论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而不可避免地是由政治活动的情势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之与政治上的进步势力或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就哲学自身而言，并不具有必然性。那种将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与政治上的进步或保守的联结视为内在的、固定不变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若考诸史实，这种将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的联结固定化的观点，同样是破绽百出的。例如，针对当时人们把相信人类的进步同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误解，恩格斯曾指出："这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显然，相信人类进步这种政治信念同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联结是没有必然性的。至于将哲学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直接等同于政治上的革命或反动，就更缺乏事实支持了。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许多革命运动是以唯物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但几乎也存在着同样多的相反的例子。例如，恩格斯曾指出，在英国革命时期，唯物主义恰恰是作为反动势力的"贵族的、秘传的学说"，而作为神学唯心主义的宗教（新教）则是作为革命势力的资产阶级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的旗帜。恩格斯对此解释道："唯物主义之所以被中等阶级仇视，既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而"复辟时代的英国贵族与之发生'矛盾'的人物乃是极端的宗教幻想者；为着要'做'与他们即反动派'相反的东西'不得不走到唯物主义"。显然，英国革命时期哲学上的派别与政治上的派别的这种关联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类关联的非内在必然性。

我们可以看到，中修哲学家对哲学的定义，无非是从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故纸堆中寻得的垃圾。他们利用进步力量的历史局限性，引用进步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犯下的唯心主义错误，闭眼不看当时的进步力量在唯心

主义错误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妄图据此来否认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往往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进而割断唯物主义同进步力量之间的联系。然而，“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中修哲学既然要为反动的腐朽的复辟资本主义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服务，就不得不走到唯心主义。我们之后会看到，中修哲学事实上滑向了唯心主义。

中修官方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世界上没有离开物质的现象，精神现象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意识而独立的客观实在。世界上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世界是统一的，它统一于物质。物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中修哲学家却将上面的马列主义的论述视为“旧唯物主义”，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里是怎么说的:

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或者说，现代唯物主义是如何规定作为现代哲学基本问题的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的关系的？毫无疑问，现代唯物主义之为唯物主义，是必然要肯定物质性活动的第一性地位的。但这里的“第一性”意味着什么，却是要仔细考察的。我们知道，以往的唯物主义是从本原与派生的意义上来规定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的，那么，现代唯物主义对于物质性活动与精神性活动的关系是否仍然在本原与派生的意义上去规定呢？回答是否定的。现代哲学不再执著于物质与精神的抽象对立，而是就人的活动自身的两个方面即物质性活动与精神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对于人的活动自身的这两个方面，仍然按照旧唯物主义的方式，规定其中何者是本原的，何者是派生的，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根本不可能，或根本不正确。首先，它无法说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必定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活动。马克思关于建筑师与蜜蜂的著名比喻就正是说明这一点的。不可想象，在人类生活中会有一种单纯的物质性活动作为本原的存在，然后从那里派生出精神性的活动来。因此，现代唯物主义必须采取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中修哲学家否定“物质与精神的抽象对立”，并且通过玩弄概念的手法，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精神和物质谁是世界的本原问题，歪曲成“人类生活中的物质性活动与精神性的活动谁先谁后”的诡辩。他们歪曲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偷运他们的唯心主义。而他们在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下面，让我们看看中修哲学家是怎样在实践的幌子下，滑向主观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

中修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里是这样供认的：

> 人与其他存在不同，其他存在种类与环境的关系都是肯定性的，即适应性的，惟有人与其环境的关系才是否定性的，因此，按照人的实践本质，按照人与自然的否定性关系，人类存在就决不可能是与其他自然存在的并列之物。从根本上说来，人类是一主体，而自然则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客体，人要通过自身的活动否定自然界对于人的目的的外在性，要驱使自然服从于自身的目的，把整个自然存在改造成为适于人类居住的家园。这也就是说，人类的存在决不是一种静观的存在，他要向外扩张，要在外部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要把自在自然改造为人化自然，把自在之物改造为为我之物。这样，人类就以其否定性的活动而对于外部自然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对人类自身的本质规定，而且同时也是对于外部自然的规定，亦即外部自然构成了人的本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没有这种外部对象，人的本质就无以成立。因此，人类自身通过其活动就连同作为其对象的外部自然一起构成了人的本质，构成了独特的人类存在。人的否定性活动，像马克思在谈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这就是说，在人类活动的范围内，一切外部自然存在都不是独立于人类活动的孤立的存在物，而是必然地在与人类的关系中存在，作为人类主体的客体而存在；因此，人类存在也就不是孤立于外部自然的存在，而是以其对于外部自然的否定性活动而存在。人类要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必须保持着他对于外部自然的否定性活动和否定性关系，对于客体的否定即是对于主体自身的肯定。正是这种人类主体对于外部自然客体的否定性活动或否定性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本质，或者说人类通过其否定性活动而构成的对于外部自然的否定性关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领域，一个人类世界。这

种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否定性关系，这一独特的人类生活世界，是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最先揭示出来的。这一发现便决定性地奠定了现代唯物主义的基础。以往的一切哲学由于不能理解这一基础而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唯心史观。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而由于这一关系的揭示，那种存在于以往哲学中的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就为其统一所取代了，人类的历史首先便是人对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是人化自然的历史。

这就是说，人类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动的事物，即"主体"，而自然是人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改造的被动的事物，即"客体"。没有人类的自然是"自在自然"，而和人类联系，人类作用其上的自然是"人化自然"。人类通过改造自然（即这里的"对于外部自然客体的否定性活动或否定性关系"），来使人类得以区别于其他事物，使人类能称自己为人类（即"构成人类存在的本质"）。中修哲学家们认为，马克思正是"发现"了"人化自然"这一"决定性地奠定了现代唯物主义的基础"的原理，才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而且，中修哲学家们还煞有介事地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来论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殊不知，这句话正是反对中修哲学家的。中修哲学家正是断章取义地节取这段话，为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服务。这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 63，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

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学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盗和怪影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整个这样的历史观及其解体和由此产生的怀疑和顾虑，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来说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例如，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这个“神的王国”除了存在于想象之中，还在其他什么地方存在过，而学识渊博的先生们不是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目前想要找到去路的那个“人的王国”之中，似乎旨在说明这个理论上的空中楼阁的奇妙性的科学娱乐——因为这不过是一种娱乐——恰恰不在于证明这种空中楼阁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意义的论调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就是说，他们假定，所有这些无意义的论调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如前所说，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并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灭它们。如果这些群众曾经有过某些理论观念，如宗教，那么现在这些观念也早已被环境消灭了。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历史的进程，归根结底是由人类的生产所决定的。这里的“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只是马克思对人类的生产，

科学实践活动的另一种说法，而决不是中修哲学家们的“人化自然”。中修哲学家所谓“人类的历史首先便是人对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是人化自然的历史”，是对马克思的歪曲。

中修哲学家之所以竭力制造一个“人化自然”的观念，是同他们的实践哲学理论分不开的。在中修哲学家那里，“实践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而是二者的统一，是“现实的活动过程””。正如中修哲学家所说的：

历史是通过“革命的实践”创造出来的，是在“现有”（物质性）和“应有”（精神性）之间斗争性地展开的。实践既是这种“斗争”的载体，也内在地蕴含着“斗争”的形式——辩证法。辩证法是通过人的能动实践对物质前提的超越得以呈现的，这里面蕴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了唯心主义，认为唯心主义高扬了能动性，是“理想主义”，而旧唯物主义却是“敌视人”的。当庸俗的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时，实际上是把辩证法所彰显的立体的革命关系偷换成了自然科学意义上平面的因果关系。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内在的革命精神就荡然无存了。（《当马克思遇见新时代》）

我们今天讲新唯物主义，绝不能先将新唯物主义归为唯物主义，将其与唯心主义彻底分割，再进一步强调它不是一般的唯物主义，是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新唯物主义是对旧唯物主义与能动的唯心主义的综合超越，它不是选择一方抛弃一方，而是集两者之所长去其所短，在它的内里是有“唯心主义”的因素的。（《大家写小书》丛书系列第二辑）

马克思建立新自然观的首要任务，便是同时扬弃旧唯物主义所坚执的直观性、受动性和唯心主义所发挥的能动性、抽象性，或者说，是要把为唯心主义所抽象地发挥了的人的能动性导入唯物主义，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

那么，为什么中修哲学家这么想认定“马克思在一定方面肯定唯心主义”？为什么它们如此热衷于将实践与物质、意识的关系揉杂在一起？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这些哲学家的所谓“新发现”—“社会实践本体论”了。

所谓的“社会实践本体论”认为在社会领域，实践是社会发展的本源，是社会领域的本体。中修哲学家们不敢直接否定物质的第一性，于是在物质世界中强行划出一个“人化自然”、“人化世界”，然后规定“人化世界”中，实践是社会发展的本源。

这种观点并不是个别学者的偶然说法，而是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修正主义哲学界逐渐形成的一条反动的理论路线。“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一元论”等概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界大量出现，并成为“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王南湜在其文章中供认，1988 年中国召开“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哲学动态》集中刊发相关论文，这一时期，“实践本体论”等概念也一并涌现出来，并且都指向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改造。

中修的反动文人并不是不要“唯物主义”这块招牌，而是将社会存在的本体从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及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偷换为抽象的实践。它们不敢公开否定物质第一性，便先在表面上承认自然在时间上的先在性，继而提出“以社会生活为中介的自然”即“人化自然”这一观点，把它当成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论突破口，并企图将实践提升为“人化自然”的根基。光明网在介绍杨耕的观点时，宣称其“确立了实践本体论”，并将这种修改视为马克思哲学“深度重构”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的文章提出，马克思的本体论“发生了转向”，哲学应当把人类的社会性实践及产生的意义世界作为本体。

马列毛主义所讲的实践，向来是现实的人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物质活动，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不能用它来替代物质作为世界本体。实践本身只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创造社会存在的神秘源头。中修哲学家们将实践的革命观点从唯物辩证法中抽离，使其脱离物质第一性以及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的实践活动，进而变成了唯心主义的哲学本原。

中修哲学家并不是发现了“新”唯物主义，而是制造了新唯心主义。中修哲学家的全部理论，都是以唯心主义为核心制造出来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分不开的。

自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即“改革开放”）以来，中修当局不仅在政治上大力推行一条资本主义路线，将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中国，在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领域，中修当局也不甘落后，大力压制革命理论，革命思想的传播，全面彻底地宣扬那些已经被昔日的革命者所批烂的死灰，并给这些死灰加上些新的头衔，好使它们不那么招人反感，以免使自己弄巧成拙。

然而，反动的事物，不会因为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而变得进步。中修是绝不可能一边进行经济上的复辟，一边又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反对复辟的革命理论的。它们的反动属性，决定了它们只会捡拾历史上的理论垃圾，为它们的倒行逆施辩护。

哲学，是中修当局进行理论复辟的一个重要阵地。中修当局彻底地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代之以反动的修正主义理论。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真理，是不随中修的否定而发生变化的。中修一方面在教科书中利用希腊语词汇“哲学”的本意①大谈“哲学是爱与智慧的科学”，“哲学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人类智慧”，在各类文章中高喊“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妄图用“全人类”的说辞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方面又在现实中压制革命哲学的传播，并在理论上反对所谓“苏马”体系（即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这正是中修进行利用哲学进行阶级斗争的表现。

事实上，中修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而是猛抓阶级斗争。正如他们自己供认的那样：“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然，他们害怕无产阶级掌握真理，于是在理论上采取淡化、歪曲的手法来反对革命哲学，这正是他们同无产阶级进行的哲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修今日的哲学实际上是西马哲学学说的“发展”。而之所以中修哲学捡拾的是西马而不是别的垃圾，是由于西马哲学是符合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的。

中修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里恬不知耻地供认：

>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哲学界掀起了哲学体系改革研究的热潮。这个“体系”，是指以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由哲学体系的改革，同时引发了关于主体性问题和“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大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这一时期，正是中修哲学家们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西马资产阶级哲学取而代之的时期。而他们在后文中供认了自己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因：

为什么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哲学体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哲学的改革首先和直接触发的就是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这首先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实践在强烈地呼唤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它要求人有更高的主体性的自觉，即要求人更加有所作为；另方面，人也需要寻找新的生活意义的支撑，要弄清楚自己在新的条件下该如何作为。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人们最需要的正是哲学，需要哲学去阐明新生活的意义，需要哲学提供生活意义的支撑，提供坚定明确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那种不关心人，不关心人的精神生活，不能为人提供终极关怀的“哲学”，是决难受人欢迎的。可见，关于主体性问题（包括“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以及随着讨论的深化而展开的对于马克思哲学中主体性思想和实践论思想的充分阐发，都是为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维度所做的努力，都是在实际上顺应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的。换言之，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变革推动了哲学的变革（首先是以教科书体系变革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教育的变革）。

“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变革推动了哲学的变革”，这就是中修反动文人们的供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推动着中修的哲学“修正”马克思主义。而之所以使用西马，“首先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实践在强烈地呼唤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它要求人有更高的主体性的自觉，即要求人更加有所作为”，即人“能够”打着“实践”的招牌，发扬主动精神，去创造人化自然（即违背物质世界的规律搞复辟）。另方面，“人也需要寻找新的生活意义的支撑，要弄清楚自己在新的条件下该如何作为。”即是说，要为“新的生活”寻找“意义”，为复辟寻找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

帝国主义发展到了腐朽没落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胜利，使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理论彻底破产。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的理论已经从庸俗，但毕竟是真诚的形式，变成了虚伪的造谣，无耻的谎言。资产阶级反动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反驳，只剩下断章取义的引用与毫无根据的曲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在自己原先的理论破产后，转而采用的，用断章取义的引用与毫无根据的曲解，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资产阶级哲学。

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反对态度的。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中修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产生的自发反对到为了复辟的需要而自觉的接受，并进一步内化为自己的理论的过程。

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批判着重点放在中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变化上，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修的一些理论家，自发地根据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真理，已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色的完成了这一使命，这些学者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倒向了修正主义的一边，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原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自发写就的著作中的真理光辉。

正如徐崇温在《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所供认的：

> “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我曾习惯性地按照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这种思潮。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渐渐感到苏联模式关于它的观点，有一些是无限上纲、站不住脚的；而它批评苏联模式的观点，有一些却是事出有因并有一定道理的。这使我认识到必须重新确立观察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坐标：不能以苏联模式的观点为标准，而必须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为评价指针。
>
> 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我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一方面，它的许多代表在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确实提出了一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有见地的见解。但由于从一开始它就用西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把不同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奉为指导思想，同马列主义相抗衡，这就使它同马克思主义区别了开来，因此不能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画等号，不能认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遭到忽视乃至偏离的问题，冲破了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在 1982 年发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专著。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以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看法，既区别于苏联东欧一些学者把它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又区别于西方一些新左派学者把它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徐崇温的这种看法，一方面反映了这些理论家，一开始是自发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正如他所供认的那样——开始时，他曾习惯性地按照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这种思潮；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些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向了反动的一边，徐崇温是向反动的一边靠拢，

但仍然在某些程度上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类文人的代表，此外，还有许多理论家彻底地倒向了反动的一边，这两类理论家虽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达到了相同的结果，即反对并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举出这些理论家自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时期所写成的一些著作，并对这些著作进行简要介绍，以帮助读者能够尽快掌握这些著作。

《保卫唯物辩证法》

这本书是徐崇温于 1980 年出版的一部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修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著作。在今日的中国学界，这本书已经饱受“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诟病。但是，敌人反对我们，说明我们做对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不符合复辟资本主义需求的理论，打成“苏联教条”，这是中修学界的一贯伎俩。所以，正因为这本书被一些中修学者垢病为“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更应当学习与分析这本书。

《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

上文中徐崇温所言的“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看法，既区别于苏联东欧一些学者把它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中，“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指的正是这本书。正因为这本书受到了敌人大肆的造谣诽谤，它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这本书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大致是正确的，其俄文版中有两处为了适应苏修反华需要，造谣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语段，但中文版已经做了删减。学习这本书的中文版，对我们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实质，认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反动本质，都有好处。

《评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

这本书是徐崇温于 1979 年写成的，和《保卫唯物辩证法》一样，这本书都在后来被看作“苏联思维模式”的著作，正因为如此，学习这本书，对我们今日的斗争是大有好处的。

关于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谈谈有关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二十一世纪中国革命的若干问题

2026 年今天，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怎样的，中国革命者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中国革命者在 2026 年急需回答的两个问题。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在今天，处于从低谷到缓慢上升的时期。而今天的中国革命者的任务，是在各地区建立革命小组，开展工人，农民，学生的群众工作，扩大队伍，积蓄力量，以期待条件合适的时候，联合成全国性的政党。

下面，我们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地回答这两个问题。

中国革命处于不发展的时期

每个投身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革命者，都会感受或者意识到今天中国革命的不发展。现在，我们来谈谈，今天的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不发展？并根据这些情况，制定出我们的任务。

事物的发展，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其中，内因起决定作用。中国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国革命在今天的不发展，其内因是运动中的错误路线，其外因是中国的反动统治的强大。

长期以来的错误路线是中国革命不发展的内因

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社会经济从社会主义退回资本主义，并逐渐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强国。经济上，社会上的变化，反映到人的头脑中，中国的进步分子，逐渐认识到了中国的变化，并不断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中国进步分子探索的大方向，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反映，这一探索是非线性发展的，不平衡的，但从大方向看，是向前进的。

中国的进步分子，是在投身中国社会运动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性，认识到马列毛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中国的许多进步分子，在六四运动后，一部分认识到先前的自由主义主张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逐渐找到了马列毛主义这一真理，另一部分仍然停留在原地，成为了自由派。还有一部分，向反动势力妥协倒退，成为了中修的政客或反动文人。而这三种分类，是就某个时期人们的思想来说的，而不是对于个人的发展而言的。还有许多的进步分子，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马列主义的真理。他们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成立革命组织，进行群众工作，从未停止过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中国革命在今天的不发展，其内因是，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在很长的时期内，执行着错误的路线。

中国有记载的马列毛主义政党中，主要成员集中于河南登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是 19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分析马毛党的路线，组织构成与具体行动，分析她的经验与教训，对于避免我们今天的运动重犯旧日的错误来讲，是必要的。

河南登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对当时的中国局势做了错误的判断，因而采取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根据反动警方的相关资料，我们会发现，登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认为，应当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以农村为根据地造反的革命道路。今天的我们，不难看出，90 年代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已经完全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的条件，在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具备了。

不仅如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在成员发展方式上，不重视政治，这是马毛党人数虽然已经有 500 余人，但是力量较弱的原因。根据反动警方的表述，马毛党发展同志的方式是“亲联亲，友串友”。这种方式发展的同志，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政治路线上的相同才投身革命，而是由于江湖义气等因素加入革命。我们还看到，反动警方的记载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骨干成员会附上如“河南省委”等头衔，而且，反动警方也记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成员通过向入党的同志“许愿”，通过封一个虚无的“官位”收买人心的方法。这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许多成员并没有达到“思想路线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的认识，并没有认识到，“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一马列主义的真理。这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观念上，因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虽然在一个地区人数众多，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革命力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党员看起来很多，实际上是很少的。又由于此种原因，其保密工作也不可能做好，故而在反动警察的渗透下很快被彻底打击。

今天的中国革命中，仍然存在着错误的路线。这些错误的路线，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核心是相同的——不讲政治挂帅，这就是今天的中国革命不发

展的根本原因。在今天，仍然有一些革命组织，采取“搞黑社会式的大哥带小弟”式的发展方式。他们不是看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正确，坚定，而是看一个人的交情是否够深。这种错误的义气挂帅路线，是中国革命在上一个时期的主要错误。

今天中国革命的任务与两条路线的斗争

今天的中国革命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符合中国形势的工人革命路线，一条是不符合实际的自封为“政治报路线”的政治报派路线。

工人革命路线，其核心是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相结合，将马列毛主义思想带到工人阶级中。其策略是，以各地区革命支部为基础，进行以工人工作为主的群众工作，以线上工作辅助各地区革命工作，进而在未来，在各地区革命组织的基础上组建马列毛主义革命党。

而政治报派路线认为，“就进行政治灌输、建立工人小组的任务来说，也应当是厂内外同志的分工协作，单讲“融工”是不足够的。知识分子融入工人或者进厂，只不过是提供了接触工人的上好机会。而政治教育不同于平日的随意聊天，是需要工人腾出大块完整时间以接受大量新知识，并频繁思考的活动。这种活动完全可以不用进厂的同志参加，并且应该不让进厂同志过多操心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内容上考虑结合时事热点准备材料，事务上如寻找场地等。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进厂同志只负责将人领到“工人夜校”处即可。”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想。今天的中国革命还处于十分不发展的阶段，地方革命组织不多，成员较少，进行工人工作的同志更少。往往发生的是，在领导一场小的罢工后，能发现几个敢于斗争的工人，愿意学习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只有一两个，而愿意投身革命事业的不一定有。这不是由于所谓的“奴性”，也不是由于所谓的“不愿意思考”，而是由于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对进步思想的恐怖的压制，使中国的许多工人“不敢言而敢怒”，虽然对修正主义有切齿的仇恨，却不敢参与斗争。

根据许多现实的经验，我们认为，在厂外建设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工人夜校”，让它发挥培养革命工人的讲习所的作用，而不成为单纯的红色读书会，在现阶段是空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建立这样的组织形式。相反，这种组织形式是我们迫切希望建设的，但在现在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这种组织形式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从来没找到有这样的组织形式的革命组织。这正如以下的情况：我们虽然在现在不进行武装斗争，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武装斗争的条件，而不是说我们放弃了武装斗争，事实正相反，我们认为，反革命的物质力量只能用革命的物质力量来摧毁，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为未来的武装斗争作准备。

据此，我们认为，政治报派路线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是在革命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要求达到第十步的成果的做法。是一条荒谬的，错误的路线。

为什么我要现在就开始准备革命?

一句话回答：革命一分钟，准备十年功。

革命形势会到来不错，但是革命形势到来并不意味着革命一定就会到来，革命一定会成功。客观革命形势足够成熟，而主观力量（先锋队）不发展的情况就会导致先锋队无法抓住机会，也无法发动群众，最终导致革命失败甚至革命不来。革命要成功，先锋队必须得在日常的群众工作中和大的政治风浪中得到足够的锻炼。

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革命呢？换句话说，革命形势是什么，它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先说说革命形势具体指什么，认识革命形势，以后才有可能抓住它。

什么是革命形势

1 .革命形势是什么，它和各种危机的关系

在这里引用列宁的话：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

列宁总结了三点：

a. 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

这一点主要指统治阶级统治期间遇到的各种危机，一般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等，在他们的统治下，社会已经陷入危机，统治不能照旧进行，社会一定会发生变化，只是大小的区别，大则群众暴起革命，小则白色恐怖把统治危机推迟。我们看看在这几种危机下，统治阶级为什么不能像以前一样统治。

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经济生活不能继续，老百姓生活不能继续，引用一段最经典的对美国华尔街经济危机的描写：　“1929 年 10 月 29 日的美国股灾在黑色星期二开始。这一天，

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在大萧条中，当时的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汽笛，胡佛敲大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等等。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奶农把牛奶倒掉，组织纠察队拦截牛奶运向奶油、奶酪加工厂，甚至用炸弹袭击工厂。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

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着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下生产已经被交换的障碍堵死，原本的资本主义快车道已经无法照旧狂飙了。

而政治危机主要指统治阶级遇到的舆论危机，比如 1905 年沙俄老百姓到教堂面前和平请愿，他们举着“求求沙皇陛下”的口号，却遭到宪兵的开枪，这次事件后就迎来了大规模的抗议罢工和 1905 革命；再近一点还有疫情在开放前夕的大量群众自发的拆开围栏上街游行以及以富士康罢工为代表的罢工潮，都是涉及到大部分群众的巨大的舆情风波，这可以说极大推动了动态清零政策的取消和彻底的解封。

列宁的用俄国的政治形势具体解释了这一点：统治力度加大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全国性的政治危机

但还不止于此。单是压迫这一点，不管它有多么严重，并不总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革命形势。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不能象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现在我们在俄国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一场政治危机正在成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了支持反革命并在这种反革命的基础上取得"和平的发展"，资产阶级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刽子手和农奴主要多少钱，资产阶级便给多少钱，资产阶级辱骂革命，背弃革命，资产阶级舐着普利什凯维奇的皮靴和马尔柯夫第二的鞭子，变成了他们的奴仆，资产阶级创造了种种以

"欧洲式的”论据为基础的理论，把 1905 年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革命骂得狗血喷头，宣布这场革命是罪大恶极的、鼠窃狗盗的、祸国殃民的，如此

尽管资产阶级这样牺牲自己的钱袋、荣誉和良心，但它自己，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也承认，专制政府和地主已不能保证"和平的发展"，已不能保证"秩序"和"法制"的起码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是不能与德国和新中国一起生存的。

俄国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形成，而且是这样一种危机，它触动的正是国家制度的基础，而绝不是它的某些部分，触动的是大厦的地基，而不是它的某一附属建筑物、某一层楼房。不管俄国的自由派和取消派怎样胡说“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胡说某些政治改革已提到日程上来（只有鼠目寸光的人才不懂得前一点同后一点的密切联系），不管他们讲了多少这种改良主义的废话，情况仍然是：没有一个取消派分子和自由派分子能够指明一条可以摆脱目前状况的改良主义的出路。

俄国人民群众的现状，由于新的土地政策（农奴主-地主势必抓住这一政策，把它看作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的事实，国际条件以及我国已经形成的普遍政治危机的性质，——这些就是由于政府和剥削阶级已不可能通过当前的道路和现有的手段来完成资产阶级变革的任务而在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全部客观条件。

b. 人民不愿照旧生活

这个条件看看上去好像跟上一个条件重复了，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不就是因为危机导致人民不愿照旧生活，奋起斗争吗？但问题是统治阶级遭遇政治危机不一定就等于被统治阶级不愿照旧生活，更不是前者的本质，否则列宁就不会分别谈这两个条件了。

因为群众的忍耐力，除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之外，还包括被压迫阶级在政治上的觉悟程度。

前一个条件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出发说的，社会秩序摇摇欲坠，制定的规则不断被挑战和打破，要么改革要么被革命；而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在阶级社会中，老百姓作为被压迫阶级其实一直都很苦，但老百姓会不会造反，其实就取决于苦的程度会不会突破老百姓的阈值，也就是能不能忍，而能不能忍其实是取决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政治觉悟，列宁在这里强调的是被压迫阶级的苦难超乎寻常的加剧，也就是从生活质量这方面突破了阈值。但同时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老百姓的政治觉悟，也就是阈值到底是多

少。而这个阈值不仅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人民的影响，能把群众唤醒到什么程度，能把阈值降低到什么程度，以俄国为例，无产阶级是只想要沙皇改良，还是推翻沙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想要进一步不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都会改变老百姓无法忍受，改变革命的阈值。（所以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不是截然分开的革命的两个方面，而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并不是说我们只能等待客观形势的到来而无能为力，客观形势也会因为主观力量而产生改变）

列宁在 1912 年对形势分析时进一步解释道：

俄国正处于革命的状态，这是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民即不仅对无产阶级而且对十分之九的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的压迫，已经加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这种加剧了的压迫、饥饿、贫困、无权、对人民的凌辱，又是同俄国生产力的状况，同 1905 年所唤醒的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要求的水平，以及同所有邻国即不但同欧洲的而且同亚洲的邻国的现状极不相称。

长期有一种观点认为，群众只有吃不上饭了才革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目前全世界最革命的民族应该是海地；1870 年代马克思也不该关注什么巴黎公社，他应该关注丁戊奇荒才对。

诚然，许多时候，特别是在封建时代和奴隶制时代，群众真的只有吃不上饭了才会革命。但自从资本主义革命以来，这个规律就已经不太适用了。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也不再局限于满足基本的生物生存需要。而且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如果某个民族的无产阶级都被逼得普遍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程度了，那么我们又能指望它有多大的革命潜力呢？相反，各国历史表明，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通过各种斗争，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也能在一定限度内，迫使资产阶级治接受诸如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同工同酬、普选权等权益，生活水平或许还能提升，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忍耐程度—如果有一个战斗的工人党正确引导，而不是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话—说不定还会稳步下降，对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都变得越来越敏感。

两次美国革命的时候，大多数美国劳动者确实吃的不见得好，但绝没有到忍饥挨饿的程度，但还是起来革命。

1848 年，全欧大革命显然也肯定不是因为欧洲突然都吃不上饭了，穿不上衣服了。

1917 年俄国工农如果只是考虑吃饱饭的话，那就什么也不做就行了，虽然会死很多人，但是协约国也承诺会发工资，啥也不做，说不定物质生活上还比内战后好几年国家工农业近乎全灭的情况好点。（不过 1917 年俄国粮食生产也确实崩了）

1918 年德国革命的时候，如果真的能夺取全国政权，那么紧接而来必然面临协约国的全面封锁，而德国的粮食库存只有不到半年，反而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德国人才能吃的上饭，但工人们还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文革就更是典型的不是吃不起饭才革命的例子。

群众是否能忍受现状，在 21 世纪的工业社会，与其说是吃饱穿暖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其组织度和阶级意识高低的问题。群众能否忍受现状往往也不是统治阶级出现政治危机，不能照旧统治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后，能否将这些危机转化成政治危机的“自变量”。实际上列宁所说的“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九章）

c.　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

群众的积极性表现在群众开始投身于独立的历史行动，在这个积极性中构成革命客观形势的包含不只是源源不断的自发行动，更重要是群众的积极性能被先锋队引导到革命的方向上去，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且不说先锋队的人员是在先进的革命阶级中产生，先锋队的能力

是在革命阶级的行动中不断磨砺的，就算凭空冒出一个训练有素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如果无产阶级的群众积极性不高，大部分群众的思想停留在叫马云爸爸的程度，那先锋队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绝对称不上具有革命形势，而只能做一些唤醒群众的准备工作。

好，我现在认识了革命形势是什么，那具体到现在，我们为了革命形势到来时能站出来领导革命应该做哪些主观准备呢?

怎样的准备才能把握住革命形势

一句话回答：做充足的主观准备，建立一支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在日常的宣传鼓动和大的政治风浪中锻炼它

如果没有主观力量正确而长期的准备，没有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组织，去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训练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的革命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这只军队的”总司令部”，那把握住革命形势和革命胜利就是天方夜谭，就是使革命运动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

我们选取一个事例来具体说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先锋队以及怎么建立它:

德国十一月革命，就是一个革命形势先于成熟的先锋队出现的例子

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俄国十月革命极为相似，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有利，却未能掀起西欧革命浪潮，更未开创人类新纪元。把失败简单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够成熟”，是完全错误的浅薄分析。我们只需稍加对比即可看出:

第一，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大挫折，资产阶级力量被极大削弱，国家机器遭到巨大破坏，统治阶级已不能照旧方式统治下去。

第二，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工人士兵的自发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第三，旧帝国政府轰然倒塌，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为革命夺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四，最初的革命力量都分裂为左右两派，而这两派的主力原本都来自同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双方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德国社民党内还有“中派”——考茨基领导的独立社民党，他们虽与右翼不同，却在革命中采取居中观望态度，未能发动群众，实际上支持了反革命一方。而俄国不仅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左派社会革命党，形成了更复杂的革命联盟基础。

第五，革命中都建立了苏维埃，但在自发阶段，苏维埃都暂时掌握在右派手里，并试图承认右派组织的临时政府。

第六，右派的临时政府又都受到更反动势力的威胁：俄国爆发科尔尼洛夫叛乱，德国则发生卡普叛乱。

客观条件如此相似，甚至德国的危机更深、群众自发性更强、旧政权崩溃更彻底，为什么结果却天差地别？核心原因就在于主观力量的准备完全不同。

在 1918 年和 191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后来的德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相比，最大的缺陷就是缺少一个真正成熟的先锋队——一个经受过革命高潮与低潮考验、具有领导基层群众能力的革命家组织。就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死后的那位德共主席所说“共产主义者没有在战前及早成立共产党，没有在 1903 年集结起来，哪怕只是组成一个小宗派，也没有组成集团，即使只能组成一个小集团，至少也能清楚地表态，对此，现在德国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感到后悔的。”

我们要的这个先锋队，最终会化为“党”这样一个组织的高级形式，让我们看看斯大林怎么描述列宁式的党的组织原则：

“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党想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么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而不是松散的“同情者俱乐部”。列宁在党章第一条中明确把党看作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作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坚决反对孟什维克那种“自行列名入党”的涣散制度。否则，党就会变成“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彻底抹杀党和阶级的界限，丧失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能力。

列宁进一步强调：党必须是统一的体系，有上下级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那些攻击这些原则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人，实质上是“俄国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害怕把党建成一座“工厂”，害怕少数服从多数，害怕中央领导分工，最终只能让革命在自发中被出卖。

共产主义者在意大利的失败更为典型。一战后的红色两年里整个意大利国家机器都几乎解体了。南方佃农打土豪，分田地。北方工人普遍夺厂，苏维埃遍地都是。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内阁或联合政府，往往一个政府刚刚成立，就在下个月宣布全体辞职。但最后资产阶级通过法西斯民族党的刺刀成功卷土从来，其原因正如意共主席所说“意大利无产阶级之所以战败，是因为它没能在合适的时机清除掉那些改良主义领导人，也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纲领清晰、能够领导工人阶级采取有效行动的政党。”

列宁在分析革命形势之后给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者的任务：

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幻想"，也谈不上什么幻想被推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客观条件的基础作用——经济危机、战争、统治阶级无力照旧统治，这些都是革命的“可能性的前提”。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没有主观力量的准备，客观条件再好也只会白白流逝，甚至变成反革命的温床。自发的群众运动像汹涌的洪水，如果没有先锋党的正确领导，就必然被右派篡夺、被资产阶级收买、被机会主义出卖。俄国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早在 1903 年就完成了与孟什维克的彻底决裂，经过十多年高潮低潮的考验，锻造出一支铁的纪律、统一意志、深入群众的先锋队，才能在 1917 年把二月革命的自发浪潮引向十月胜利，开创人类新纪元。而德国和意大利左派恰恰缺少这一主观准备，于是最有利的客观条件反而成了悲剧的舞台。

任何时代，如果没有一支按照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革命先锋队——一个真正有组织的、纪律严明的、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的战斗司令部——那么，就算客观条件成熟到极致，革命也必将遭到镇压或被篡夺成果。主观力量的准备，是把革命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决定性环节。

具体到现在，我们要做、能做什么准备?

一句话回答：做好组织工作，搞好群众工作。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拒绝消极精神，有问题提出来多交流不憋着，来把握好革命形势的到来。具体到当下，我们能做的客观准备很多，要做的客观准备更多。

列宁对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成熟先锋队的指导如下:

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像《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放在自己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从事编织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网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

些事件。《火星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所记载的那些游行示威，他们也没有错过。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所有的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游行示威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之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干扰，又不中敌人的诡计！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们特别坚决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口46］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组织上，以列宁的全国政治报为例，要能在革命到来时起到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在革命前获得全国大多数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权威并且锻炼先锋队领导群众的能力，而权威和领导群众的能力只能在生产斗争和思想宣传中获得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各个重点的工业城市、工业区和工厂里有我们党的组织在革命前就扎根在厂里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同时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的秘密性保证党能够在革命时期掌控全局做出正确的指挥，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张由职业革命家和群众组织支撑起来的，党盘踞在中间协调指挥的秘密蜘蛛网，这张网遍布全国而极具组织性和秘密性，使敌人绞尽脑汁也无法阻止革命的到来，我们要建立的就是这样的一张网。

（当然，列宁从来没有，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认为过各国共产党人只有通过办政治报才能建立先锋队，这里列宁的政治报计划是依据当时俄国的特殊国情而制定的计划，而不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就像工人暴动夺取主要城市并不适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一样。当代中国的工人革命路线，是

列宁政治报建党路线在今日中国的新发展，他们都要求一张由职业革命家和群众组织支撑起来的，党盘踞在中间协调指挥的秘密蜘蛛网）

而这张网是怎么织成的呢?

和蜘蛛网一样，网丝和蜘蛛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我们的党，党成员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先进群众中出现少数几个点互相联合培养新的先进群众，在群众工作中形成自己的组织，成功掌握某一部分群众的组织之间互相联合，在不断的斗争中形成一个顽强的党；而我们的群众组织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党成员去成立、掌握的。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们当下要做的准备就是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挑选其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先锋队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磨砺组织和个人的能力。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看起来革命形势还没到，我们现在做准备也太早了，没必要吧?

如果不现在革命会怎么样

一句话回答：现在不革命，以后资本家要我们的命。资本家不会因为我们的忍让、退缩而减少他们的剥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要么我们退要么他们退，我们现在不革命，不为未来做准备，资本家只会剥削得越来越厉害，无所不用其极，我们永远也不能达到那个必然到来的共产主义。无数的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1992 年致丽大火案就是一个典型，无产阶级不反抗，一味忍让，最终竟会惨死在资本家为了减少那一点点的建筑成本的消防隐患和加长工时的铁丝网中。这个压迫的逐渐加深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鱼老了之后更没有精力反抗屠夫，屠夫也有更多的手段对付它，具体而言，劳动力老了之后，资本家就会有更多的筹码压迫你，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大，让你加班，扣你工资你都得受着，找个理由把你

辞退了不给赔偿，你去告官，赵国劳动局和资本家穿一条裤子，告了也没用。只能找新的更脏乱差的工作，时薪 6 元的清洁工全国到处都是，都是四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因为工资太少打两份工的大有人在，上完白班上夜班，捡完垃圾扫厕所。只要不反抗，不准备革命，资本家不仅会想方设法把我们的生命力榨干净，而且还会让我们的后代也成为一枚用完即弃的螺丝钉。道理是很简单的，无产阶级的孩子 99%还会是无产阶级，如果我们不革命，那么我们的孩子也会遭受我们曾遭受的苦难，而且更深更重。

革命形势到来把握不住会怎么样

一句话回答：革命形势一旦来临，要么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将危机转嫁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陷入更深的深渊。在帝国主义时代，万一资产阶级真的遇到了重大的危机，战争将会是必然的出路，死亡将成为悬在每一个无产阶级头上的利剑，在战场上，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下一场冲锋。战争本质是政治的延续，帝国主义战争本身也是国内统治无法维持，只能转嫁危机的结果。对帝国主义而言，发起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资本的输出是必要的，而在全球共用一个市场的情况下，不仅帝国主义自己的市场已经饱和了，全球的市场也已经饱和了，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用实力来解决，也就是战争。我们从最熟知的二战法西斯看，日本德国意大利无不是国内危机之后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右翼上台，将国内危机转嫁给侵略国，但也只是靠军事独裁勉强维持。统治阶级将整个国家转化为战争机器，只能以战养战，以纳粹德国为例，刚开始吸取了之前一战的教训，刻意地先用强制劳工、掠夺物资的方法吸外国的血反哺国内，在战前美国大萧条冲击导致德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背景，让老百姓感觉生活确实变好了，但此时炸弹已经埋下了，这样的福利制度是跟着战争形势走的，是向魔鬼以未来战争一定会胜利为抵押物借来的贷款，前线一旦崩溃，国内将会为之前的疯狂掠夺和财政透支买单，被侵略国反击，大面积轰炸，首都被破，德国民众大规模变成难民，只能在防空洞下随时紧绷神经围绕空袭过日子，德国民众始终是战争的炮灰，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先进的人现在就开始准备，落后的部分，到危机时也不得不直面我们革命者面对惨淡的人生，曲折的道路，并不是天生

的共产主义超人，而是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支持着我们前行，但有的革命者并不对未来觉得乐观，因为敌人太强大，工作难开展，我们在这里简单谈谈这个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帮助他们重拾信心，这个乐观并不是傻乐，而是来源于对敌我力量的客观认识。

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毛主席说：所有反对派都是纸老虎。就是一种典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实力强大，但是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都会被人民拥护的共产党所打败，我对革命的未来十分乐观。凭什么这么乐观呢？因为纸老虎虽然唬人，但终究是纸做的。从发展的眼光看，他只是目前强大，但是未来会逐渐衰落，因为他们是压迫剥削人民的一方，人民可能一时被他们愚昧，但是不可能永远被他们唬住，人民会意识到只有反抗才是出路，会逐渐来到我们这一方——反抗压迫的一方，敌人会逐渐衰弱，但我们会逐渐强大。到现在也是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帝国主义可以被我们打倒，我们才会投入精力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如果这样反抗没有出路，那不过是飞蛾扑火，没有人会去做的，就像民粹派刺杀沙皇成功之后，反而来了一位更加残暴的沙皇，民粹派便被证明无法拯救当时的人民，俄国的有志青年们都不会继续从事这项错误的事业。

但是，我们说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能转化为傻乐甚至盲目乐观，因为纸老虎虽然是纸做的，但是它仍然是只有威胁的老虎。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

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这个道理放到这里就是：现在是革命准备阶段，我们要尽可能积攒保全力量，不做无意义的送死行为。本身敌强我弱时就要灵活的采取手段，防范极左错误。例如没有清楚群众是否大面积支持时就急忙操办罢工罢课一类的大运动，如果最后支持的不多，他们领头的也太过于明显，被抓进去，同时群众参与不深、领悟不到，就是盲动的错误尝试，佳士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最后，我们用一些话加以概括：

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基本矛盾长期积累。

在阶级社会中，压迫、剥削和贫困长期存在，但并不必然引起革命。只有旧制度难以维持、社会矛盾达到临界点，革命形势才会形成。

革命形势首先表现为“上层不能照旧统治”。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战争失败、财政枯竭等危机使统治集团难以维持原有秩序。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危机，被压迫阶级的不满便有了突破口。同时，革命形势还体现为“下层不愿照旧生活”。群众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突破了他们的忍耐限度。战争、饥荒、失业、苛捐杂税、土地兼并、民族压迫等，都可能把群众推向反抗统治集团的斗争。革命形势还表现为群众积极性的空前提高。在 20 年等于一天的平常时期，群众分散、沉默、忍耐，在一天等于 20 年的革命时期，社会压迫和上层危机迫使群众投身政治斗争。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通过罢工、起义、夺权等革命行动，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但是，革命形势不等于革命。客观危机只能提供革命的可能性，不能自动推翻旧政权。革命的真正发生，还需要主观条件。革命阶级必须要有领导自己的组织，把自发的反抗提高为自觉的斗争，将群众的力量组织成打垮旧政权的革命大部队。

因此，革命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上，旧制度已经不能照旧维持，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主观上，革命力量必须能够组织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把社会危机转化为摧毁旧世界的革命行动。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的论述。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资本论》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马克思：《论权威》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列宁：《国家与革命》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讲话》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以上引用的革命导师的言论，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现在有一些人鼓吹“用和平斗争的方式就可以获得胜利”，并且举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等等的例子，我们应该明白，哪怕是没有太多流血的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也是革命人民得到了葡萄牙政府武装的支持，才得以迅速地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其本质是剥夺了葡萄牙反动政府的武装，是完全的也是最好的暴力革命。

有人会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恩格斯在 1890 年致康 · 施拉姆的信中指出，“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由此说明“无产阶级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革命目标”，说什么当前的资产阶级国家革命形势低迷，“长期不存在暴力革命形势，今后就更难出现暴力革命形势；反之，工人阶级却可以利用议会民主进一步争取自己的权益。”以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政党的议会路线打掩护。他们不仅没有结合历史阅读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认识到恩格斯的时代还存在着通过议会斗争获取胜利的可能性，而是在事实上麻痹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幻想软化人民群众的斗志，妄图以此确保自己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千秋万代。

实际上，嘴上说着“利用议会民主”的修正主义者，事实上是从来不讲“民主”的。哪怕是“议会民主”，他们也是不会让步半分的。在国内，哪怕是虚假的“民主”也引起了他们的极度恐慌，他们用尽镇压的手段，去反对任何的民主尝试，在国外，他们援助、支持当地的反动政府，去镇压追求自由民

主的进步人士和革命战士。他们在六四运动、伊朗反神权游行中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中，在尼泊尔革命、哈萨克斯坦暴动等一场场革命运动中，镇压、屠杀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人士。面对要求自由民主的群众，他们什么时候讲过民主？他们立即撕下支持“议会民主”的外衣，举起屠刀，去杀人了。

革命成功后，一定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用宝剑镇压反革命

反革命在掌权的时候要镇压革命者，革命者在掌权时也要镇压反革命。既然资产阶级在掌权时，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在掌权时，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是专政？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

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在由于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

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泽东：1975—1976 年相关指示

革命导师教导我们，专政就是一个阶级用“铁的手腕”，“除恶灭害”，从经济上，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旧的统治阶级以及旧的阶级的残余影响。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在这个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从经济上、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在各方面的残余影响。

正如张春桥同志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所指出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

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

—117—

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

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只是由于反动势力在当时过于强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遭到了失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不是很彻底的。这是由于当时反动势力在党内、在全国十分强大的缘故。我们今天的革命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今天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应当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得多。我们的革命组织从一开始就应当重视革命路线。思想和路线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不同的路线是社会上不同阶级利益、立场的反映。坚持革命路线的组织，应当同反对革命路线的组织划清界限。同反对革命路线的组织划清界限，就是同社会上的反动阶级划清界限。在革命成功之后，我们应当坚决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地从经济上、精神上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在各方面的残余影响。

我们应当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讲任何仁爱的，他们在今天，一边装出一副仁爱的模样，企图软化无产阶级群众，一边举起屠刀镇压我们的同志，幻想阻挡历史的车轮，在无产阶级胜利后，他们又一边装作一副仁爱的模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在各个领域煽风点火，妄图恢复自己的天堂。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经验。

因此，无产阶级在下一次胜利后，应当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比曾经的任何革命都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待大风起焉，浪潮掀。

让我们扫去这梦魇。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